

深职院党委深入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扎实推进“三育人”改革工作

11月13日，深职院在留仙洞校区明德楼109室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会议主题为：深入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扎实推进“三育人”改革工作。学校领导、党委委员以及全体中层干部参加学习。党委书记、校长刘洪一主持会议。

学校党委副书记陈小波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的主要精神，着重指出了全会公报所明确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目标、六大改革领域、改革重点以及15项具体任务。

党委书记刘洪一结合学校实际，就如何深入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继续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扎实推进“三育人”改革提出要求。他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中的一件大事，不仅决定了中国的未来，甚至也影响到世界的发展。接下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将发布。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深刻领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和丰富内涵。公报有许多新突破、新理念、新表述，字里行间都体现着国家未来改革开放的方向和策略，希望大家高度重视，深刻领会其中的意义和内涵。

第二，要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来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前两个阶段扎实深入，成效明显。在整改落实和建章立制阶段，要把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后续工作善始善终做好。

第三，结合学校“三育人”改革，深入推进学校的内涵式发展。深职院“三育人”改革理念与国外及台湾许多高校的办学理念不谋而合，我们在合作交流中多次发现，各自的表述有别，但精神内涵高度一致。下一步，我们要以专业文化为抓手。专业文化是专业的核心要素，我们要力争在专业文化建设上有所突破。

第四，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把上级的统一部署与自学相结合，最后的落脚点还是要结合学校实际工作。深职院发展的前20年在全国领先，怎样实现我们的升级版继续保持领先？还是要深化“三育人”改革，要靠内涵、靠思想、靠实干。

会上，刘洪一对学校近期工作作出部署。一、正式启动学分制改革，计划在2014级学生中实施。二、做好2014年招生计划的编制。三、做好文博会分会场申报及相关工作。四、提高行政效率，提高管理水平。五、健全安全管理，各个部门、房间都要明确责任人。刘洪一还介绍了海峡两岸高职论坛的情况。刘洪一最后强调，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心态阳光，积极干事，把学校“三育人”改革扎实推向深入。

(党委办公室 党委宣传部)

市发改委书记王庭珠一行到深职院调研工作

11月12日下午，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书记王庭珠、社会发展处处长彭鸿林等一行三人来深职院调研工作。校党委书记、校长刘洪一，副校长杨润辉在留仙洞校区明德楼101会议室接待了王庭珠一行。党委宣传部、计财处、后勤基建处等部门负责人参加了调研。

王庭珠一行首先在杨润辉的陪同下，对深职院华侨城校区、留仙洞校区进行了实地考察，深入了解校区环境改造、边坡治理等情况。在调研会上，刘洪一结合学校发展，就学校“十二五”规划中将建设的学生运动场(馆)、教学及科研用房、校区改造等七个项目进行了汇报。王庭珠对深职院的办学理念以及所取得的办学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表示将继续大力支持深职院的发展。对于华侨城校区整体改造的构想，她提出，深职院在明确该校区的办学定位后，要加快对现有建筑的检测和新校园的规划布局。

王庭珠还逐一对将建设的其他项目提出了具体建议，希望学校重视前期工作，立项时做到内容全面、理由充分、匡算准确，切实解决基建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计财处)

刘洪一校长率团出席在台北科技大学举行的 2013 海峡两岸技职教育学术研讨会

2013年10月25至11月1日,刘洪一校长率领外事处、职教所、机电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等教师和学生代表团共22人,出席了由台北科技大学承办的“2013年海峡两岸技职教育学术研讨会”,并应邀参访了高雄餐旅大学、台北海洋技术学院、亚太创意技术学院、龙华科技大学、东南科技大学和台北科技大学等合作院校,期间和东南科技大学等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就两岸招生安排、师生交流、教学与科研合作、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广泛地交流,宣传了深职院三育人办学理念,推广了深职院明年将举办的深圳文博会分会有关项目,看望了深职院在亚太创意技术学院、龙华科技大学交换学习的学生,此次台湾之行取得丰硕成果,圆满成功。

来自海峡两岸共10多所技职校院的代表,近300名学者专家齐聚台北科技大学参加2013海峡两岸技职教育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开幕论坛以“两岸高等技职教育校院治理与创新”为主题,共同聚焦学校发展定位、创新创业、数位教学、产学合作、职业训练、人力发展及教育政策等议题。职教所为会议做了充分准备,77篇论文集中共收入深职院教师论文19篇。

刘洪一校长以“教育自觉与复合育人”为题发表了大会主题报告,从“教育自觉的提出、教育偏差的反思、复合育人的理论与实践”三个大的方面,阐述了中国大陆高职教育发展的重大转型策略和学校三育人工作系统改革与定位,提出了“主动服务社会发展需求、主动适应人的发展需求,实现教育功能和回归教育本义”的重要观点,引起与会代表和社会的极大反响,台湾《联合报》等重要媒体对刘校长的观点进行报道和引述。机电学院冯小军教授主持了产学合作研究分报告会,刘兰平研究员的“广东省职业院校专业建设质量品牌探析”、陈雁杨教授的“中国体育源流新论”、徐冬冬老师的“高校教师目标导向与工作校绩的关系”、李娟娟副院长的“高职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的创新与思考”,杨叶飞等老师的“基于校企协同的复合型营销人才育人模式的探索”论文作为会议代表在分报告上发表。

由深职院团委谢文兵、学生处刘栩老师以及9名学生代表组成的学生代表团到出席论坛开闭幕仪式、参观台北科技大学校园和台北的历史人文景观、交流两岸大学生自主管理

模式和校园文化建设。东阳旭、陈君妮、谢贤盼、陈嘉颖等四位学生代表接受了台湾公视电视台记者的访问，他们分别从学校“三育人”办学理念、复合式创新型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志愿者之校”建设、社团振兴工程、学生自主管理、学生参加国际国内竞赛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台湾技职院校和媒体给予高度关注。在闭幕式上，深职院学子表演了精心准备的《德业并进 自强不息》现场书法表演、传统乐器笛子伴奏粤语版《彩云追月》、双人古典舞蹈、古文朗诵和合唱《相亲相爱一家人》等节目，受到全场热烈鼓掌。刘洪一校长代表 2014 海峡两岸技职教育学术研讨会承办方，将学生现场书写“德业并进 自强不息”书法答谢台北科技大学姚立德校长，并向与会代表发出了明年出席深圳会议热情洋溢的邀请。

(职教所)

刘洪一出席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建校十周年 庆典并做文化育人报告

11月7日至8日，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建校十周年庆典暨文化育人与高技能人才培养高峰论坛在上海隆重举行，教育部职业院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刘洪一出席论坛并作专家报告。

在高峰论坛上，刘洪一作了题为“文化育人：回归教育本义——关于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新思考”的主题报告，他根据产业升级社会转型时期对高职教育的新要求，分析了当前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提出高职教育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探索一条适应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高职院校文化素质教育之路。他着重强调了专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指出专业文化是专业之核心要素，专业之软实力，专业之精髓，要切实改变重硬轻软、重表轻里的专业建设偏差，以专业文化建设为抓手，大力提升专业建设内涵，建设特色鲜明的高职院校文化。最后，他从分析文化、文化育人的内涵入手，阐述了“文化育人是回归教育本义”的深刻论断，并结合深职院和教育部职业院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具体实践，提出了推进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的主要路径。

刘洪一的报告观点深刻，内容丰富，受到与会专家、代表的高度好评，尤其是关于专业文化建设的思考在与会专家、代表中引起强烈反响。

(文化育人办公室)

深职院与西雅图城市大学合作办学 举行 2013 级新生开学典礼

10月29日，我校与美国西雅图城市大学合作办学软件技术、物流管理专业开学典礼在留仙洞校区明德楼109会议室隆重举行。我校副校长杨润辉、西雅图城市大学副校长 StevenOlswang 及中国发展部主任许亚南出席开学典礼，学校学生处、外事处、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计算机学院、管理学院领导及专业教师代表和学生家长代表参加了典礼。本次开学典礼采用国际化的形式，从主持人到发言者全部用英文发言。

典礼上，杨润辉副校长代表学校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说，今年是两校合作的第二年，合作专业由去年1个增加今年的2个，标志着两校的合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希望我们要珍惜机会，利用合作办学的平台，借鉴国外办学的先进经验，提升我们的课堂教学和管理水平。他希望两校在办学过程中，能加强沟通和协作，确保教育质量。他也希望同学们要秉承“德业并进，自强不息”校训精神，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刻苦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和水平，努力成长为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化专业人才。

西雅图城市大学副校长 StevenOlswang 发表讲话。他说，非常荣幸可以和深职院联手办学，培养国际化，高素质的人才，也欢迎在座的同学加入美国西雅图城市大学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第二期的中美合作办学班。这个班的同学将会接受到美国和中国两地优秀老师的教学，并有机会飞往美国在西雅图城市大学完成学士学位的深造。他希望同学们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拓展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知识，学习对将来职业有帮助的技能。

教师代表周任重发言中给学生们提出了三点建议：希望同学们能集中精力，好好学习；保持开放心态；向前看，不放弃。新生代表郭晓男发言，感谢西雅图城市大学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给大家提供这么好的学习机会。

在师生共绘“德业树”环节，全体师生在小卡片上写下对合作办学项目或对自己未来三年的目标和愿望，并粘贴在“德业树”上。有待在三年后的毕业典礼上，开启尘封的卡片。师生共绘“德业树”，对教师来说寄托了对同学们成才的厚望和对项目成功的希望，对同学们来讲是许下三年的愿望树立三年的目标。

通过国际化的开学典礼，该项目的新生得到了美国西雅图城市大学文化的熏陶，感受到了与其他学生“不一样的精彩”。据悉，2013级软件技术、物流管理专业是中美合作班的

第二届学生，本届两班共招生 56 人。学生前三年在我校进行语言和专业学习，学分修满后，可获得我校专科毕业证书及美国西雅图城市大学基础教育和管理证书。毕业后，可前往美国西雅图城市大学进修一年，获得该校本科学位证书。这对于我校学生来说，无疑又增加了新的提升和发展机会。

(计算机学院管理学院)

经济学院“三育人”实验学院揭牌

11月5日下午，留仙洞校区明德楼109会议室隆重举行了经济学院“三育人”实验学院揭牌仪式。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刘洪一，党委副书记陈小波，副校长唐晓鸣、杨润辉、温希东、张效民、陈秋明与经济学院院长查振祥共同为经济学院“三育人”实验学院揭牌。学校各部门党政一把手出席了仪式。

刘洪一对经济学院先行为深化学校“三育人”改革探索新路的创新精神表示了肯定和支持。他指出，在通过近期对台湾五所著名高校的考察和交流中发现，我校“三育人”改革方针的提出具有先进性，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学校应进一步推进和落实该项举措。同时，他希望，我们也应在一些不足的方面向一流的技术大学学习，提升综合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经济学院院长查振祥随后表示，经济学院将勇当先锋，为学校“三育人”改革摸索经验，希望得到全校各部门的支持，共同做好“文化育人、复合育人、协同育人”这项工作。

(经济学院)

深职院领导班子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

根据市委的统一部署以及深职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安排，10月23日，学校领导班子利用一整天的时间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党委书记、校长刘洪一，党委副书记陈小波，党委委员、副校长唐晓鸣、杨润辉、温希东、陈秋明，副校长张效民，党委委员谷茂、钟江生、陈国梁等出席会议。市委第八督导组组长陈洪博、副组长曾珊红，市纪委派驻第十一纪检监察组组长林冰，市委实践办谢新同志，市委第八督导组组员林浩杰同志、雷丽霞同志，市委组织部干部三处高顺萍同志等到会指导。党委书记、校长刘洪一主持会议。

会议首先通报说明了专题民主生活会有关准备工作情况。随后，学校领导班子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紧扣为民务实清廉主题，对照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实施办法，聚焦“四风”问题，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武器，认真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

会上，刘洪一代表学校领导班子进行了对照检查，带头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查摆和剖析，接受班子成员及其他党委委员的批评意见与建议，对班子成员提出批评意见与建议。六位党员校领导逐一作对照检查，深刻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明确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大家实打实地摆问题、亮短处、挖根源，结合实际提出整改措施。在自我批评中，开门见山，直面问题，主动担责；在互相批评中，坦诚相见，有的放矢，言之有物。在查摆问题上体现了“准”、在剖析原因上体现了“深”、在批评提醒上体现了“诚”、在整改措施上体现了“实”，既让大家出出汗、排排毒，又给大家鼓干劲、加加油，达到了提高认识、增进团结、互相帮助、推动工作的效果。

市委督导组组长陈洪博对学校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的准备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用“主题明确，态度认真，分析深刻，措施得当，气氛融洽，效果良好”二十四个字对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给予了高度概括。

刘洪一作了总结讲话。他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学校来说是一场及时雨，对学校中心工作改革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他强调，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只是一个好的开端，

接下来要按照王荣书记在市委常委会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精神，立足于把民主生活会的成效转化为整改落实和建章立制的行动自觉，绝不能有“闯关”的心态、绝不能有“松劲”的念头、绝不能有“了事”的想法，要继续坚持领导带头，认真消化、吸收、研究、整改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继续紧密结合中心工作，把全校各级、各单位、各部门的力量调动起来，扎扎实实做好后续环节各项工作，深化推进“三育人”改革，推动教育实践活动取得更大成效。

(党委办公室)

学校举办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项目校内验收会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13]26号)和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为了做好工业设计、物流管理两个专业的验收准备工作，10月29日，学校举办了“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项目”的校内验收会议。来自校内外的专家组一行5人(校外4人，校内1人)听取了两个专业的自评汇报，审核了验收材料和数据平台。专家组认为，两个专业的项目建设总体上符合教育部、广东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进一步提高验收材料的质量，专家组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要求两个专业紧密围绕“产业支撑型”这一专业类型定位，突出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这条主线，以“三育人”理念为指导，进一步提炼专业建设的特色，完善项目总结报告的撰写。专家组还对平台数据填报进行了具体指导。

(教务处)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来深职院艺术设计学院访问

10月31日上午，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家居灯饰亚太区设计总监 Kulkarni, Unmesh Shankar 及人力资源总监刘兵来深职院艺术设计学院访问。

周立群院长首先讲述了学院的基本情况，介绍了学院的育人理念、模式、特点、优势、目前在校企合作方面的现状及成绩。Unmesh 在介绍完公司基本情况后，表达了对艺术学院在教学方面取得的成绩的高度赞赏，希望能和学院进行校企合作，并接纳优秀的学生到该公司实习。双方初步达成在11月中下旬启动项目合作的意向，约定将在合适的时间进行深度合作。

Unmesh 一行还参观了艺术学院设计研发中心的7个工作室。

（艺术设计学院）

中组部专题研究班到深职院进行现场教学

11月4日下午，中组部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题研究班的24位学员到深职院进行了现场教学活动。学员由辽宁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厅局级党政领导干部组成，中组部、外国专家局和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也派出了随班人员。深职院党委书记、校长刘洪一，党委副书记陈小波在留仙洞校区明德楼109会议室热情接待了研究班学员。

现场教学活动中，刘洪一介绍了学校的整体发展情况；来自管理学院酒店管理专业的专业主任容莉老师介绍了学校酒店专业在校企协同育人方面的具体做法；双方围绕高等职业教育与现代服务业的关系等主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研讨。学员们非常认可深职院的办学理念、办学成果，来自新疆各地市的领导和辽宁省的领导都表达了与深职院进一步深入合作的强烈意愿。

（管理学院）

德国 F+U 教育集团萨克森总部总裁访问深职院

11月4日上午，德国 F+U 教育集团萨克森总部总裁 Volkmar Meinhold 先生在总经理 Kathleen 女士和助理李红女士陪同下访问深职院。刘洪一代表学校对 Volkmar 总裁一行的再次来访表示热烈欢迎，接着介绍了学校近期的发展规划，重点分享了新建凤凰山校区在国际化发展及产学研用领域的战略定位，并当即邀请 F+U 教育集团利用其职业教育优质资源与深职院合作共同开发国际培训项目。

Volkmar 总裁首先代表 F+U 教育集团全体员工对刘洪一校长和全体师生致以问候。他说，F+U 集团在中国开展项目已经有十几年，合作伙伴众多，深职院是一直以来彼此相互信任、合作基础最好的伙伴，此次来访加深合作也是 F+U 集团的愿望。他还分享了集团与德国工商会合作在成都、宁波成功设立教师培训中心开展针对培训师的培训情况。他还说，德国职业教育在跨专业培训的同时还注重加强学员的个人素养培养，如学习主动性、团队精神、守时观念、卫生习惯等等。

刘洪一表示，德国在学生软实力方面的培养正契合了深职院的三育人理念，两者说法不同但内涵是一样的。他还说，德国职业教育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国家正在借鉴德国的经验和做法建立我们自己的职业教育体系。刘洪一表示，结合国家教育发展战略和深圳市“十二五”高等教育规划，深职院将从德国、英国及台湾地区合作院校中重点挑选几所参与深职院“协同创新中心”建设项目。他邀请 F+U 教育集团参与此项目，合作开展国际培训，Volkmar 总裁对此深感兴趣，表示将全力支持双方联合开发合作培训。

杨润辉与 Volkmar 总裁就两校科研合作、共同组织研讨会、学生留学及夏令营项目逐一进行了详细磋商，F+U 集团拟定于明年3月组织萨克斯州高校汉语专业学生来深职院举办夏令营项目。

(外事处)

深圳地铁订单班启动仪式举行

近日，深圳地铁订单班启动仪式在深职院西丽湖校区图书馆报告厅隆重举行，学校副校长陈秋明，深圳地铁集团公司纪委副书记、运营分公司党委书记徐涛，深圳地铁集团运营分公司人力资源部劳资室主管马卫宁，汽车学院院长贺萍，机电工程学院和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等领导，城市轨道交通专业全体教师及通过面试的114位同学出席会议，会议由汽车学院党委书记罗成龙主持。

陈秋明首先对顺利通过深圳地铁笔试和面试的同学表达了祝贺，对深圳地铁与深职院成功开设订单班表示祝贺。他回顾了深圳地铁的发展历史，对深圳地铁在十多年内取得的成绩表达了赞叹。陈秋明接着介绍了深职院与深圳地铁合作的历史，最后勉励同学们要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认真学习，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地铁员工，为深职院争光！

徐涛书记则对深圳地铁的文化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在提问环节，同学们纷纷就关心的问题提问，各位领导和负责人进行详细的解答，最后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会后，学院领导、城轨专业骨干教师又与深圳地铁公司领导就具体细节进行了磋商。

（汽车学院）

深职院获省化工类中青年教师说课竞赛一等奖

11月14日-15日，首届广东省高职教育化工技术类中青年教师说课技能竞赛在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州校区举行。深职院化生学院副院长、广东省高职教育化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林峰带队，应用化学技术类专业群教师徐志娟、蒋晓华在本次大赛中喜获一等奖，罗大为获二等奖，罗超云获三等奖，学校荣获团体一等奖。

首届广东省高职教育化工技术类中青年教师说课技能竞赛由广东省教育厅高教处主办，广东省高职教育化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协办，旨在展示化工类教师教学技能，搭建高职高专院校教师教学技能交流平台，促进校企合作，提升教师专业技能水平。

（化生学院）

中国国防工业首席专家段忠教授做客机电学院 文化育人讲坛

10月30日，中国国防工业首席专家，中国国防教育基地主任，深圳市工程师联合会会长段忠教授莅临机电学院文化育人讲坛，做了一场题为“工程师的光荣使命与创新”的讲座。段忠教授以当代工程师存在的难题为切入点，用一个个鲜活的例子先后阐释了工程师的角色定位与历史沿革、工程师为世界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工程师的责任、工程师的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工程师组织的创新和我国工程师体制改革的趋势。段忠教授还分享了自己的企业经历和人生经验，希望在座学生夯实专业基础，积累工程师的必备素质，培养严谨踏实的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做时代的弄潮儿。在自由交流环节中，在场学生踊跃提问，段忠教授一一给予耐心、细致的回答。

(机电学院)

深职院专家组赴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对口支援

为全面落实2013年度对口支援西藏职业技术学院行动计划，10月23日至25日，学校派出专家组前往西藏职业技术学院进行对口支援。此次专家组组长为管理学院院长罗钢教授，成员有党委宣传部部长韩树林、管理学院陈代芬副教授、咸适博士，建环学院陈绍名博士。罗钢在西藏职院图书馆视听室作了题为《情感能力与个人成长》的讲座；韩树林在西藏职院常务副院长江村的陪同下与10多位来深职院进修及挂职过的干部教师座谈，了解他们对深职院的亲身感受及意见建议，并在会后对长期分管对口支援工作的江村副院长进行了专访，进一步就深职院对口支援西藏职院的具体工作进行交流和探讨；陈代芬、咸适、陈绍名在财经系、旅游系、建筑系主任的陪同下参观了实训室并进行了座谈，与各系专业教师就物流管理、礼仪与形象、建筑工程等专业课程建设、教学方法、师资建设进行交流并提供指导意见。

(继培学院)

- ◇ 刘洪一校长一行出访俄罗斯、捷克
- ◇ 深职院隆重举行 2013 年暑期社会实践总结表彰大会
- ◇ 台湾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副校长樊国恕访问深职院
- ◇ 台湾东南科技大学校长李清吟访问深职院
- ◇ 深职院喜获 2013 年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高职组网络课程类一等奖
- ◇ 机电学院学子斩获 2013 中国机器人 Robocup 公开赛二等奖
- ◇ 深职院喜获第十三届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高职理科组二等奖
- ◇ 深职院思政课教师黄牡丹、房尚文在省教学比赛中喜获佳绩
- ◇ 第十四届广东省大学生物理实验设计大赛深职院学子再创佳绩
- ◇ 全国大学生击剑锦标赛深职院健儿再获佳绩
- ◇ 深职院图书馆与海南大学图书馆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深职院快讯)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产业文化育人联盟成立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产业文化育人联盟日前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成立。联盟将整合各方资源，构建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社会团体组成的产业文化育人工作交流平台，探索职业教育产业文化育人的途径与方法，推广院校产业文化育人优秀成果，创新院校产业文化育人机制，推进全国职业院校产业文化育人工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联盟将重点推进产业文化育人在职业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学生实习实训以及教师产业文化素养提升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从教产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高度，明确产业文化育人的目标和任务。

中国职教学会副会长、科研工作委员会主任余祖光任联盟荣誉理事长，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苏志刚任联盟理事长。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株洲市中等职业学校等全国各地 27 家中、高职院校为联盟理事单位。

（《中国教育报》2013 年 11 月 13 日）

咸阳职院与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咸阳职院与西咸新区沣西新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针对沣西新城正在建设的国家级信息产业园、大数据处理中心及学院电子信息类专业的发展需要，合作共建信息产业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合作培养信息维护、软件开发、数据处理专业人才；合作开展员工教育和培训；合作开发科研项目、共同申报科研课题，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实施政府、企业信息化项目；沣西新城积极为学院毕业生提供实训和顶岗实习岗位，安排学生就业。

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既是学院校政合作的又一重大成果，也是服务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推进西咸经济一体化和西咸新区建设的重要工作。双方将共建六个基地：一是共建人才培养基地。二是共建科技研发基地。三是共建社会服务基地。四是共建文化基地。五是共建全民健身基地。六是共建国际交流基地。

（《陕西省信息》2013 年 11 月 18 日）

“江苏省工业设计中心” 落户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13 年江苏省工业设计中心和工业设计示范园、示范企业认定工作日前结束，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传媒艺术系“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工业设计中心”获得“江苏省工业设计中心”认定，该校成为唯一申报成功的高职院校。

该校在申报过程中仔细研究制订申报方案，加强协调与资源整合，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申报工作进展。经市经信委初审推荐、省专家评审、现场答辩和网站公示等程序，近

日，江苏省经济与信息委员会经济运行局正式公布了申报结果，“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工业设计中心”申报“江苏省工业设计中心”获得认定，认定有效期3年，实现了艺术设计专业省级平台零的突破。该校将充分利用好“江苏省工业设计中心”这一平台，结合淮安丰富的文化资源，带动苏北地区的工业设计发展，促进企业的经济转型。同时，进一步探索高职工业设计教学特点，建立更加合理实用的课程体系，打造好高职院校工业设计品牌专业。

（《江苏省信息》2013年11月14日）

第七届全国水利高职院校 “齐鲁杯”技能大赛举行

近日，第七届全国水利高等职业院校“齐鲁杯”技能大赛在山东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大赛共设工程测量工、制图员（水利工程CAD）、水利施工图预算编制、单片机系统快速开发、水环境监测工、坝工土料试验工（常规土工检测）等6个项目（工种），共计333名学生参赛。

经过激烈的竞赛，荣获团体总分前6名的水利高职院校分别是：山东水利职业学院、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并列第五）、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并列第五），有9所院校获最佳组织奖。

（《中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2013年11月18日）

国家工程中心落户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10月31日，从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由铜仁职业技术学院、贵州梵净山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及贵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联合共建的“民族中兽药分离纯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中心”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

“民族中兽药分离纯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中心”建设在铜仁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

和梵净山生态农业科技园内，计划投资 6200 万元。在铜仁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 1200 平方中兽药提取纯化实验室，1000 平方引种驯化组培实验室，5000 平方试验科技大楼；在梵净山生态农业科技园建设 3000 平方中兽药制剂生产线及科研大楼，2000 亩动物养殖场，420 亩仿野生药材种植基地等。该工程中心的建成，将研发 1-2 种中兽药原料，2-3 种中兽药制剂，1-2 种纯天然饲料添加剂实现成果转化或产业化，实现产值逾亿元。

该中心紧贴贵州生态畜牧业大省及纯天然中兽药产业可持续发展需求，仅仅围绕贵州资源特色和优势开展中兽药研发创新，面对全国现代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需要，集研究开发、技术创新、工程化实验、中试产业化、凝聚培养人才为一体可持续发展创新平台。建设好工程中心是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国家骨干高职院校重点建设专业药物制剂技术专业、畜牧兽医专业实验实训基地建设的重要内容，充分利用高校人才团、技术成果及科研平台建设工程中心，理好的发挥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及重点专业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更好的服务产业、服务社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贵州省信息》2013 年 11 月 4 日）

湖南水电职院就业主打“专业对口牌”

近日，湖南水电职院成功举行了 2014 届毕业生校园招聘会。来自水利水电行业的 100 家用人单位，共为毕业生提供了 2000 多个就业岗位，涉及水利工程、电力工程、工程造价、装备制造等 20 多个行业，95% 的岗位需求与学院开设专业相一致。全院 1600 多名 2014 届毕业生，将近 500 人在招聘会当日就与企业达成签约意向。参与招聘的广东水电集团公司人事部长郑锦忠每年都带队来学院招聘员工，他评价学院毕业生基本素质好、吃苦精神强，现场一次性他就与 34 名毕业生签订了就业协议。

作为全省唯一一所培养高级水利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职业院校，湖南水电职院把“特色办学”理念贯穿于治学理校始终。在专业设置、课程建设、思政工作、服务管理等各个方面均围绕水利特色做文章，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近五年，学院的就业率都在 93% 以上，且 90% 以上为专业对口就业。初步统计，学院毕业生目前在湖南水利系统中担任领导职务者达 400 多人，具有工程师以上技术职务的近 3000 人，已经支撑着湖南水利事业基层工作的“半壁江山”，为湖南水利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据悉, 以此次校园大型招聘会为起点, 学院年内还将陆续根据用人单位需求分专业安排 50 场左右的招聘会, 为毕业生提供择业就业机会。

(《湖南省信息》2013 年 11 月 11 日)

广铁职院与加拿大社区学院协会 签订合作办学意向书

近日,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与加拿大社区学院协会 (ACCC) 合作办学意向签约仪式暨国际职业教育培训会举行。签约仪式上, 双方就合作培养学生、教师交换与专业培训、学生夏令营活动等方面达成了共识。ACCC 副主席 Paul Brennan 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项目官员沈玫参加了签约仪式。

培训中, ACCC 前主席、项目顾问 Gerry Brown 先生介绍了加拿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和发展模式, 指出加拿大职业教育具有机构自治、依托社区、连接行业企业、以学生为中心、灵活调节及向全球开放等六大特点, 并重点就专业开发、绩效评价及领导力建设作了讲解。

(《广东省信息》2013 年 11 月 14 日)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与澳大利亚启思蒙学院 签署合作办学协议

10 月 28 日-11 月 3 日, 应澳方邀请,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闫远东, 党委委员、副院长刘洪东等一行 3 人, 赴澳大利亚启思蒙学院 Dandenong 校区实地考察并签署合作办学协议。以此为标志, 泰山职业技术学院在国际化合作办学中迈出了实质性新步伐。

在澳期间, 闫远东等在启思蒙学院 Maria (玛利娅) 校长和 Chris (克丽丝) 副校长陪同下, 参观了学院的教学环境和实训室, 考察了“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 双方在前期交流的基础上, 深入交换意见, 最终在会计、建筑与建造、机电一体化、电子工程等 4 个专业上签署合作办学协议, 就招生规模、费用及支付方式、教师培训、教学计划等细节达成共识。另外, 双方还就一些比较关心的合作项目展开讨论, 并形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据悉,启思蒙学院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最大的公立职业技术教育学院,位于墨尔本市东南区,有4个校区,每年约注册有来自44个国家(地区)的学生55000人。

(《山东省信息》2013年11月7日)

现代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经验交流会 在江苏常州举行

现代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与机制创新经验交流会10月21日在江苏常州举行。会议由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主办、常州科教城承办,160多名职业院校代表参会。

会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协会副会长、校企合作委员会主任龙德毅发布了《中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报告2012》的有关内容。宁波市教育局、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湘电集团、天津渤海化工集团、青岛西海岸职业教育集团、中德诺浩教育投资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分别介绍了政府推进、政行企校四方共管、企业办学、行业牵头职教集团、职教集团实体化运作、第三方参与校企合作等创新经验。会议旨在通过对现代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与机制创新的探讨,在全国院校间交流经验,同时以基层实践促进国家顶层设计。

(《中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2013年10月31日)

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隆重举行

10月26日,以“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为主题的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国际会议厅隆重举行。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刘占山,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副所长高瑛,宁波市教育局副局长胡赤弟,浙江省教科院院长方展画,《中国高教研究》杂志主编王小梅,人大复印资料《职业技术教育》主编谭旭,吉林省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和《职业技术教育》杂志社副社长刘海,以及来自国内其他高校职业教育研究专家和来自亚非拉各国的39位教育界官员、专家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与会嘉宾围绕主题，对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的现状、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刘占山会长做了“中国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政策选择”的主题发言，从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国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方针和主要政策、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国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法律保障等六个方面阐述了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状况，指出中国职业教育在今后的发展要坚持对外交流与合作，推进由“引进来”向“走出去”发展战略，促进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的共同发展；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国际合作与比较教育研究室主任刘育峰围绕大会主题，发言讲述了对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研究的若干思考；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黄建如副教授做了“新加坡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特色”对新加坡高职教育的发展历史、特点及优势作了系统分析，为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改革与创新提供了借鉴；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王琳璞做了题为“工作学习教育：南非新的技能培训体系”，比较详细的介绍了南非职业教育的新特点，为了解非洲职业教育提供了新视野；温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丁金昌论述了“培养高职特色人才、助推区域产业发展”的办学思路。

此次学术研讨会还邀请了 20 几个亚非拉国家的 39 名职业教育工作者参加，巴基斯坦、斐济、赞比亚等国代表做了主题发言。通过研讨与交流不仅增进了各国代表之间的友谊，也对进一步推进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机遇和空间，为我国职业教育寻求国际合作，做好国际教育援助，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战略提供了参考。

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于 2013 年 4 月份由教育部职业教育中心研究所、宁波市教育局和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三方共同签署共建协议，正式成立，目前与学院高教研究所（宁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合署办公。自成立以来，已完成了对非洲 22 个英语国家职业教育概况的梳理，目前正集中力量对南非职业教育体系进行深入研究。研究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理事长由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所长王继平担任，教育部职业与技术教育研究所、宁波市教育局、华东师大职成教研究所、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江苏省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吉林省职业教育研究中心、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社会与职业教育研究院、《中国高教研究》杂志社、《职教论坛》杂志社、宁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和商务部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援外基地等共为理事单位。

（《浙江省信息》2013 年 11 月 1 日）

校企合作试行现代学徒制培养高职人才

11月5日,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与北京华恩投资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爱亲学院揭牌仪式举行。会上企业与订单班学生签订准员工协议,明确了学生既是学校学生又是企业员工的双重身份,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企业计算工龄,设立奖学金,毕业后直接上岗,到岗后补发(缴)学习期间的工龄工资与社保费用,对品学兼优的毕业生有创业意愿的给予创业扶持等,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校企合作试行“现代学徒制”培养高职人才的正式启动。

(《江苏省信息》2013年11月7日)

综合示范又获硕果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示范基地建设助推Y两优689通过国审

“Y两优689”是温州科技职业学院自主选育的两系中晚籼水稻品种,该品种抗病性强,病虫害发生轻,还具有低节位分蘖多,产量高,米质软,口感好,深受农民欢迎,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通过多年的综合示范,以点带面,Y两优689于2011年通过浙江省审定,2012年通过了国家生产试验,2013年10月18日通过国家审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011号)。

示范基地建设助推Y两优689,与科技学院项目组突出重点的示范工作、讲求深度的服务工作是密不可分的。突出服务方面,项目组给种粮大户免费提供示范种子,同时利用水稻育种科研团队,精心设计示范方案,对示范方进行全程跟踪管理,认真抓好关键技术环节。在播种、移栽、抽穗扬花及成熟等稻苗生长关键时期派专人到示范基地蹲点指导,及时观察稻苗生长状况,做好生产技术指导,确保项目的实施效果。突出管理方面,示范方建立相应的质量管理措施、生产档案和责任制度:采用“示范基地+种子推广部门+种粮大户”的管理模式,并聘请技术顾问,责任到人,确保项目顺利、高质量地完成。在院三农服务中心等部门的支持下,通过联系各县(市、区)农业局、种子站,同时示范方负责人选择具有多年水稻种植经验责任心强,技术水平高的种粮专业大户,为完成示范工作奠定了良好保证。突出示范点,突出本市的示范点布置,结合省内,拓宽到全国的战略布局。

为加快 Y 两优 689 通过浙江省审定即在我市各县推广速度, 2012 年, 我们在温州地区各县共建立单季稻 Y 两优 689 示范片 9 个 (乐清 1 个 160 亩、瑞安 2 个各 100 亩、苍南 50 亩、永嘉 50 亩、平阳 100 亩、文成 50 亩、瓯海 50 亩、泰顺 25 亩各 1 个)。在温州市共推广种植 Y 两优 689 品种 2.41 万亩。

对于示范基地建设,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领导给予高度重视。院领导班子明确项目牵头单位三农服务中心具体负责这项工作。院领导根据项目建设内容, 每年落实专项经费 50 万元, 主要用于基地建设、技术培训、现场会召开和技术服务等工作, 其中在近三年内支持 Y 两优 689 综合示范经费就有 23 万元。同时院里还出台了《农业综合示范基地建设管理办法》, 对于积极参与项目建设的示范户和种粮大户以及在项目实施中作出突出成绩的项目负责人给予政策支持, 激发项目建设人员和示范户的积极性, 为项目的成功实施建立长效机制。

(《浙江省信息》2013 年 11 月 5 日)

全球首个中文版“慕课”平台开放在线课程

10 月 10 日, 由清华大学打造的全球首个中文版“慕课”(MOOCs) 平台——“学堂在线”(www.suetangx.com) 正式推出。清华大学的《中国建筑史》《电路原理》等 5 门课程, 麻省理工学院的《电路原理》, 以及北京大学《计算机辅助翻译原理与实践》将作为首批上线课程对外开放选课。今后“学堂在线”还将积极引进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名校的高质量在线课程。

(《科技日报》2013 年 10 月 15 日)

国研中心：要求大学实现“去行政化”

日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国研中心”)首次向社会公开了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所谓“383”改革方案, 是指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方案提到,

逐步实现大学去行政化，探索建立由校董会、校长、监督机构组成的大学治理架构，让教育家办教育，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放宽办学限制，鼓励国外一流大学来华合作或独立办学，引进国际通行的教学和科研管理机制。

（《新华网》2013年10月28日）

山东：高校学生可自主定制“课程表”

10月22日，山东省教育厅等4部门发布《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分制管理规定》。学生可在一定范围内自主选择专业、课程、学习进度和任课教师，还可跨学期、跨专业、跨班级、跨学校选课。每门课程学分的计算以该门课程在培养计划中安排的课时数为主要依据，1学分一般折合16-18学时。鼓励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发明创造或参加科技、竞赛活动获取创新学分或奖励学分。

（《大众日报》2013年10月23日）

建议开展四年制高职本科教育试点工作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职业教育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仅要求职业教育要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协调发展，同时要求职业教育内部相互沟通，构建与专门技术人才培养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人才成长“立交桥”，打通职业教育向上发展的通道。从人才结构来看，职业技能型人才、高端技能型人才、应用型本科和专业硕士都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层次。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从事职业教育的本科院校，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的培养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开展四年制高职本科教育试点、实行“专业学士”学位制度，与专业硕士学位贯通，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培养通道，既是学生发展的诉求，更是经济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为此，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健建议开展四年制高职本科教育试点。

1. 在全国范围遴选一大批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紧缺专业, 设立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学士学位制度, 初步形成中高职衔接的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沟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满足人们对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需求; 完善与优化高等教育结构, 优化专业设置, 扩大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规模, 满足社会对多样化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需求。

2. 建议遴选一批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开展四年制高职本科教育试点工作。纵向上, 根据社会人才需求和技能型人才成长规律, 拓宽职业学校毕业生继续学习渠道, 拓宽职业教育学生进入高一级院校继续学习的渠道。横向上, 围绕区域发展总体规划和主体功能区定位时不同层次、类型人才需求, 与其主动对接, 合理确定中等和高等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规格, 注重各级职业教育在培养目标、专业内涵、教学条件等方面的延续与衔接。

3. 建议引导一般本科院校加强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 优化专业和学科设置,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加强专业建设和实习实训建设, 从而引导一般本科院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 开办四年制高职专业学士学位教育, 发展专业硕士教育, 打通人才成长“立交桥”。

(《教育与职业》2013年第34期)

江苏建院变“督教”为“督学” 全域助优人才质量

近日,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下发《教学督学工作实施办法》, 将原来的教学质量管理部门的“教学督导”职能拓展为质量管理办公室的“督学”职能, 使原来以单一的督教为主扩展为督学、督教、督管, 涵盖了人才培养全过程。

为推进督学工作顺利开展, 学校组建了督学团和督学组, 60名教授、教学专家和教学管理干部被聘任为两级督学。二级督学组负责对本院(部)的督学, 并接受学校督学团的指导。学校督学团的主要工作则是围绕各二级教学院(部)、教务处、学工处、实验实训与职业技能管理中心、后勤管理服务中心等各部门开展督导工作。年终学校督学团和院(部)督学组要对各自工作进行总结, 并向学校教学督学工作领导小组汇报。质量管理办公室作为常设机构协调督学团和督学组的工作。两级教学督导管理体系, 使人才培养的督导活动实现全域化, 使学校决策层能准确掌握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状态, 助推教师提升教学能力, 提高学校管理水平, 促进学生成才成材。

为确保督导组督导有力,学校从成员选配、职责划分、结果使用、督导程序等各方面予以了明确,并组织开展了专门的培训。院(部)督导组一般由3-6名督学组成,由院(部)领导担任组长,督学组成员中原则上需有一半以上的普通教师参加,其全部成员专业方向能覆盖本院(部)全部专业群。督学采取听课、座谈、测评、查阅教学资料(培养方案、课程标准、教案、学生作业、试卷等)等形式,对教师教学水平进行督导和评价,并以报告的形式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学效果进行综合评价。每位教师一年内须经三名(或三名以上)督学分别独立进行督导评价;由督学组长指定一名督学对三名(或三名以上)督学的评价进行综合,形成该教师教学质量年度专家评价报告,向教师当面反馈。职评时专家评价项的成绩将直接采用该结果,同时作为年度评优、评先的参考。同时督导报告也作为各班级学生总体学习状况评价体系的指标之一,纳入班级评先评优。

(《江苏省信息》2013年11月5日)

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理论认识

一、正确认识和理解现代大学制度

要理解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和理解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大学制度是一个中国化的概念,西方学者较少直接使用这一概念。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广泛使用“现代大学制度”这一概念,并对其内涵和特征进行了持续研究。

大学制度就是关于大学管理或治理所形成的管理或治理框架、规则体系和制度安排。应该说,无论中外,有了大学就产生了相应的大学制度。在大学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都存在大学制度,无论这种大学制度是大学演变自然形成的还是在政府和社会干预下形成的。

在西方,中世纪大学是现代大学的源头。中世纪大学滋生和确立了大学独立、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大学理念,开始了大学的制度化过程。大学通过比较完善的制度逐步建构成为一种定型化的、专门的、独立的学术与教育机构,形成了一种“行会型”大学制度。在德国的“第二次大学革命”中,柏林大学基于新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创造了一种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学术社团型”大学制度。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则创造了一种面向市场和社会需求的“社会服务型”大学制度。这种大学制度经过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所说的“现代大学”、克拉克·科尔所称的“多元化巨型大学”、伯顿·克拉克定义的“创业型大学”

等大学理念的冲突和融合之后，传统大学逐步演化为“现代大学”，大学制度也相应步入现代大学制度阶段。

我国近现代大学是世界现代化过程“冲击—反应”的产物。通过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延请西方教习、开办洋务学堂、移植和借鉴西方大学理念和制度等来建立近现代大学和高等教育体系。我国的大学制度先后经历了学习和借鉴欧洲国家大学制度以及美国大学制度的过程。从1949年至1978年的30年间，在经历了“苏联模式”和解放区高等教育模式（大学制度）的激烈冲撞之后，形成了一种政治和教育高度融合的“革命化大学制度”。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重新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大学制度，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大学制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所指的是特定时期的大学制度。它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大学逐步进入社会的中心并产生众多利益相关者之后，面对复杂的大学内外部关系和矛盾而形成的关于大学的制度安排以及指向未来的趋势。从历史演进来看，现代大学制度是大学制度在中世纪大学萌芽后，在保持大学传统、应对环境变化、响应社会需要的过程中，经历近千年的磨合和调适，“进化”到现代所形成的大学制度。我们称之为“现代”大学制度，以区别于在此之前的大学制度。

一般说来，现代大学制度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宏观方面或者高等教育体制方面，主要涉及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大学与大学的关系；二是微观方面或者说大学自身层面，主要涉及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其核心是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的特征，教育部前部长周济同志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报告中的论述具有代表性，即“重视大学自我发展与自我约束机制的有机统一，强调大学办学自主与社会职责的相辅相成，追求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平衡和谐，鼓励大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密切结合”。

目前，要理解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有几个关键性认识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

第一，现代大学制度并非目前的、西方国家的大学制度。在对现代大学制度的认识上，有一种从时间和区域意义上来理解的观点。从时间意义上看，认为现代大学制度是关于“现代大学”的制度，当今世界的大学都可以称之为“现代大学”，因而现代大学制度就是当前已有的大学制度。从区域意义上理解，认为西方国家高等教育和大学系统比较发达，现代大学制度就是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制度。这种理解是有失偏颇的。大学制度是关于大学的一种制度安排，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大学制度安排，因而有不同的大学制度。现代大学制度意指“大学制度”的“现代版”，其核心概念是“大学制度”而非“现代大学”。

因此，现代大学制度并非“现代大学”制度，不是关于“现代大学”的制度，不是当前的“大学制度”。西方发达国家的确探索出了一套比较先进的大学制度，但大学的制度安排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国家教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现代大学制度是就世界范围内的大学制度而言的，人类社会的各种文明、各个国家都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这就是说，现代大学制度是建立在当代世界文明成果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的大学制度。

第二，现代大学制度具有指向未来的理想特性。现代大学制度中的“现代”（modern），一词，既具有时间意义，又具有价值意义。就单纯的时间概念讲，中西方对“现代”一词的理解是不同的。中国把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称为近现代史，西方国家（欧洲国家）则把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称为现代史。其实，历史分期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时间节点的确定。中西方对“现代”起点的不同确定，以及以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事件作为标志，本身就说明“现代”一词是兼具时间性和价值性的。正如“传统”不是单纯的时间概念一样，“现代”也不是单纯的时间概念，它们都具有价值特性，并且与未来直接关联。我们今天称之为“传统”的东西，在过去它就是那个时期的“现代”；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的东西，在未来它就是“传统”。如此看来，单纯从时间意义上来理解现代大学制度没有实质性意义，现代大学制度呈现状态性与过程性兼具的特点。正如“现代化”具有追求发展和进步、表现人类美好追求的价值意义一样，现代大学制度也是一个具有价值特性的概念，具有追求完善、指向未来的理想的大学制度的意义。

第三，现代大学制度是普适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大学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追求和“世界性性格”的机构。在现代社会，虽然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存在重大差异，各国也建立了不尽相同的大学管理制度和高等教育体系，但大学在基本性质和理想追求上却具有高度一致性——大学是学术和文化机构，是文化传承和知识生产机构，是教育和人才培养机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学者治校成为各国大学坚守的基本信念和追求的基本目标。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同国家大学的相互借鉴和影响以及不断加强的大学国际化趋势，使各国大学更具相似性、共同性和国际性，形成共同的理念、制度和价值追求。在全球信息化时代，大学文化、大学制度正在超越地域限制和意识形态壁垒，形成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大学制度的全球流动。在大学发展史上，大学制度、大学模式、大学理念相互借鉴和相互影响的例子屡见不鲜。新中国的大学制度建设就受到了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深刻影响，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我国当前的大学制度和模式中看到苏联模式的影子。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办就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德国的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而美国结合

本土实际和经验创造的威斯康星思想和大学制度，在二战以后风靡全球，各国高等教育和大学无不受其影响。这就是说，在相互影响和借鉴中形成的现代大学制度，具有在全球流动和发展的趋势。这就是现代大学制度普适性的表现。

但是，大学制度又是一国对自身高等教育体系和大学系统做所的一种制度安排。大学制度安排与国家的政治制度、行政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高度相关。在现代，特别是国家全面介入高等教育和大学之后，大学制度成为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影响。大学制度因此表现出鲜明的国别特色而具有多样性。

第四，现代大学制度仍在发展变化中。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当前的现代大学制度仍然在进一步发展之中。这种发展，是在遵循大学传统和应对变革的张力中进行的。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大学的理念和制度都在进行调整。现代大学制度当前正在经历的变化，从外部来讲主要有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的调整。随着大学社会作用不断加大和重要性不断加强，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大学的干预和影响，大学也越来越通过应对和满足多样化社会需求来获得社会资源和财政资源，这就给大学自主、大学自治的理念和制度带来了严峻挑战。与此同时，大学的组织形态和社会角色也在变化，如多元化巨型大学、创业型大学、官产学研联合体、全球高等教育超级联盟、数字化校园甚至数字大学、大学公司或公司大学等新型大学形式的出现，给大学的理念和制度带来强烈冲击。

从大学内部管理和治理来讲，随着大学与社会关系的日益广泛和紧密，以及大学社会职能的多样化，特别是社会问责制引入高等教育系统后，过去松散的大学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现代大学的发展需要，传统的“教授治校”模式已不能满足大学的发展要求。大学开始调整内部组织架构和管理行为，大学中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迅速分离，行政系统和行政权力逐渐强化，学术组织（学部、院系）与职能部门的关系更加复杂，大学日益表现出行政权力主导的特点，甚至出现了大学职业经理人（管理团队）来管理大学的现象。就大学与大学的关系来看，由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各国大学系统越来越形成适应多元化社会需要的分流、分工、合作和竞争的院校功能体系，不同类型、不同服务面向、不同适应性的多样化院校体系已经形成。

二、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思想内涵

（一）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特征

第一，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首先必须是现代大学制度，必须体现现代大学制度的共

同特点和发展趋势。不能因为强调“中国特色”而偏离现代大学制度的共同特征和共同要求，“中国特色”绝不意味着与现代大学制度的普适性内容和特征相冲突。过分强调国情而排斥普遍规则，“中国特色”就会成为不改革不发展的“挡箭牌”，我们建设的大学制度就不是现代大学制度，就不是具有现代意义和价值指向的大学制度，就是“落后的”大学制度。我们也不能把“中国特色”和“现代大学制度”对立起来；否则，强调“中国特色”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第二，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必须有利于中国大学的健康发展和大学社会作用的充分发挥。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建立和完善大学制度，促进大学的健康发展，有效发挥大学的社会作用。因此，那些落后的、阻碍大学健康发展和社会作用发挥的体制机制等因素，不能是“中国特色”的。比如，“文革”时期实行的以教育极端政治化为特征的“革命化”大学制度，虽然发生在当时的中国，但它不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大学缺乏自主权和大学的行政化运行也不能是“中国特色”，因为就世界范围来看，大学自产生以来就是独立的学术与文化机构，必须有高度的自主权，必须按照学术生产的逻辑运行。“大学官本位”也不能是“中国特色”，因为“官本位”文化不仅是我国的一种封建文化糟粕，而且也与现代民主政治和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严重不符。

第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主动适应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和改革发展趋势的大学制度。所谓主动适应，就是完整体现大学的本质特性，在充分发挥大学自身价值判断基础上的适应，而不是不加选择和判断的被动适应。主动选择和适应，既指对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实特点的适应，也包括对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发展趋势的适应。在某种意义上，主动适应也意味着超越和批判。大学是有独立价值追求和价值标准的，特别是在教育和文化价值方面，大学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适应现实文化，更在于超越现实文化，批判现实文化，引领社会文化发展。

（二）现代大学制度“中国特色”的来源

按照上述特征，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之“中国特色”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高等教育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高等教育法》第三条规定，国家“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事业”。

二是中央政府是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事业的举办者和管理者，统筹全国高等教育发展。

《宪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第八十九条第七款规定，国务院“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高等教育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第十四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管理由国务院确定的主要为全国培养人才的高等学校。《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举办学校，同时规定了各级政府的高等教育权利和义务。

同时，我国始终强调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全国统筹。《高等教育法》第六条规定，国家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第二十四条规定，设立高等学校，应当符合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三是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内部领导和管理体制几经调整，最后确立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等学校党的委员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高等教育法》以法律形式对此予以确认，其第三十九条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第四十条规定：“高等学校的校长、副校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任免”。

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框架及其完善

按照现代大学制度的普适性要求以及“中国特色”的来源，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制度安排由三个层面所构成。就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层面而言，其基本框架是大学自治、依法办学、政府管理；就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其基本框架是社会参与、中介协调、开放竞争；就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而言，其基本框架是党委领导、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术自由。

要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框架，目前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如下领域加大改革力度。

一是着力改革和调整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涉及面广，但核心在于确立大学自治的理念和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把高等学校建设成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确立大学真正的独立法人地位。由于历史原因和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我国近现代大学自诞生以来就承担着抵御外侮、富民强国、振兴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

我们奉行的是“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缺乏西方大学那种延续了数百年的“大学自治”、“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加上几千年来形成的高度集权的管理文化和管理体制“惯性”，大学长期置于政府的直接管控之下，甚至演变为政府的附属机构或延伸机构。大学不能自治，就无办学自主权可言。我国历次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主要调整的是中央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在管理大学上的权力分配关系，而没有涉及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关系，没有确立大学自治权和自主权。大学的办学权来自政府授权，要经过政府的“授权审批”。大学接受政府委托和授权，作为政府的“被委托人”和“代理人”开展教育活动和办学活动。

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中央集权管理和地方分权管理两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但这是针对高等教育宏观管理而言的，而不是针对大学办学而言的。可以说，在日本实行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之后，世界各国大学都实行了高度的大学自治体制。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两个平等主体的关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高等教育集权管理体制并不必然导致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因此，我们需要参照国际惯例，处理好“管教育”和“办大学”的关系，即政府宏观管理高等教育，高校自主办学。《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政府要进一步转变职能，减少审批事项。真正将之落到实处，首先必须确立大学自治的理念，从法律上、制度上确认和保障大学是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

二是着力改革和完善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二战以来，高等教育已逐步进入社会的中心，产生了众多利益相关者，大学力求对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做出最快反应和最大适应。但是在我国，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由此带来的政府对大学的过度保护；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还比较僵硬，大学对社会需要的变化反应不及、适应不够，社会问责体系和市场竞争机制还没有作为一种约束机制进入大学办学领域中，由此形成了我们特有的“办好大学很难，办垮大学也很难”的现象。因此，目前改革和完善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关键在于在确立大学作为独立自治法人实体的前提下引进完全的市场竞争机制，革除高等教育领域的“双重体制”，促使大学从而向政府办学转向面向社会和市场办学，从高等教育质量的政府评价转向社会评价和市场评价。

三是着力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涉及大学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西方国家是在把大学看作学术与文化组织的前提下来讨论学术权力问题的，即大学是学术组织，大学治理必须保证学术权力的主导作用，行政权力只是一种辅助性力量。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的干预，包括大学引进和建设专门的强大的管理团队，目的不在大学

的行政性目标,而在于大学作为独立自主主体其卓越学术目标的达成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对我国大学而言,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面向政府办学的特点,我们在大学的定性和定位上与大学的现代性相去甚远,实际上把大学办成了政府的附属机构或延伸机构。大学以行政级别以及校长和行政人员的“官员制”和“任命制”与政府行政体制相对接,完成了与政府行政机构同体同构,因而大学内部以行政权力为核心建立起管理框架和科层体系,大学的行政化运行由此大行其道,学术权力因既无制度保障也无实际的附着机构而“虚化”。这就是说,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在我国大学与西方大学之中有着本质不同。

对我国大学而言,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除了处理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之外,还要考虑如何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问题。关键在于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于大力倡导学术自由并建立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体系。

第一,党委领导是党委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校长负责也不应是校长个人负责。从本质上讲,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是“一长制”而是“委员会制”(委员会实行会议议决制,重大决策和规章等由委员会通过或决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委员会主任只拥有最后的票决权;首长负责制是指重大决策和规章等由首长会议决定,即便只拥有少数人支持,但首长拥有最终拍板权),是一种集体领导、集体决策和民主管理的框架,对涉及学校改革发展的重大事项、干部任免和学校规章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常委会会议议决制。但是,我们社会的文化观念往往在“一长制”思想基础上陷入“是书记领导还是校长负责”,“是书记拍板还是校长拍板”的对立思维中。我们也过分渲染了个人对大学的作用,希望塑造个人权威,寄希望于出现“巨人型”大学领导者而忽视了建设能够产生好的大学领导者的大学制度。其实,“在好的大学制度下,好的大学校长是成批涌现的;在不好的大学制度下,好的大学校长是个别出现的”。在现代大学多元共治理念和民主协商管理制度下,“巨人型”、“权威型”领导者观念明显落后于时代,不符合现代大学发展的实际。它也是我国大学主要领导者之间不和谐甚至产生冲突的思想和文化根源。在某种意义上讲,目前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运行中的问题,主要不是领导和管理体制本身的问题,而是“家长制”和“官本位”文化的问题。在“家长制”和“官本位”文化之下,大学实行任何形式的领导和管理体制,其结果可能都是一样的。同时,党委领导从内容上讲就是落实党对大学教育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保证大学教育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导和保障大学实行民主管理和共同治理。

第二,改进大学校长的选拔任用方式。大学校长的选任方式是沟通大学制度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的桥梁或枢纽。就大学外部关系而言,它连接我国的行政体制和干部制度;就

大学内部关系而言，它直接影响大学内部管理的组织架构和管理干部的选任。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大学校长的选任在具体细节上有较大差异，但共同点在于，在确认大学是自治组织的前提下，大学校长由大学自主推选（遴选）和决定。大学校长既非国家和政府官员，也无行政级别，只是学校的行政首脑，领导管理团队管理学校事务。大学中的学院（系、所）只是纯粹的学术活动单元，院长（系主任、所长）并非学校管理层级中的成员，不担负行政管理职能，由此围绕卓越学术目标形成一种服务型的扁平化管理框架。《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改进和完善大学校长的选任办法。要搞好这项改革，必须参照国际经验，重新对大学进行定性与定位，将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来看待。根本点在于，我们能不能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党管干部原则的前提下，重新思考对大学校长及其行政系统的管理干部所实施的“官员制”和“任命制”，对大学这种学术组织的行政首长采取区别于其他领域领导干部选任的思维和方式，采用更加民主、更加公开、更为灵活的选任办法。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建立起符合现代大学组织特性、体现现代大学制度基本精神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第三，确立学术自由的文化观念。在西方社会和西方大学中，学术自由的观念与生俱来。学术自由源于大学的学术特性和追求真理的特性，大学作为独立和自治的学术组织，从事学术生产，追求真理必须要有学术自由。学术自由也是现代大学制度的理念和文化基础。在大学的千年发展史中，学术自由是大学所极力追求和维护的核心价值和信念，是大学处理与宗教教会、世俗王权、现代政府和市场、学术团体内部关系所遵循的基本准则，也是学者生命的真谛。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尊重学术自由，首先需要正确理解和认识学术自由。学术自由首先是一种社会文化价值观，需要全社会确立学术自由观念。西方国家的学术自由不只是针对大学的，而是针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即就是说全社会都天然地理解、接受和确立了学术自由的观念和文化。当某种力量伤害到学术自由的时候，不只是大学而是整个社会文化都来极力维护和捍卫学术自由。如果社会和文化没有形成学术自由的观念，只是大学去争取和维护学术自由，这种学术自由终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目前，学术自由在我国还只是停留在大学诉求层面，还只是学术工作者的呼吁，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发育和形成学术自由的社会文化共识。因此，建设一种全社会共识的学术自由观念，是“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的当务之急。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现代学术自由绝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学术自由，学术自由与学术的社会责任是相辅相成的。不讲社会责任的学术自由不仅会对学术自由本身造成伤害，而且也缺乏实现学术自由的社会条件基础。

（《教育研究》2013年第11期）

扩大高等院校专业设置自主权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 社会对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产业结构决定就业结构, 就业结构又决定专业结构。在工业转型升级和服务业大发展的背景下, 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的专业结构优化调整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在专业设置问题上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方面, 高校专业和课程设置趋同, 造成教学资源浪费, 并造成大学毕业生结构性失衡。同时, 高校教学目标和课程设置等过度追求理论性和学术性, 忽视技术性和职业性, 以致部分大学生职业素质和岗位技能不能适应经济形势和用人单位需求。

另一方面, 目前我国高校专业目录的制订主要依据学科体系的分化, 对社会分工和高新技术发展的考虑明显不足。对专业名称、学科划分、主要专业课程等内容进行全国统一的界定, 虽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是, 这也导致高校难以及时调整专业和课程设置, 不利于发挥高校的办学特色, 不利于高校实现为地方优势产业和新兴行业培养人才的职能。

针对上述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 浙江理工大学副校长杜时贵提出以下建议:

1. 拓宽专业设置面。地方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应面向行业与地方, 满足地方建设对技术人才专门化、职业化的要求。在大众化教育和产业结构迅速调整的前提下, 专业设置不宜过细, 知识结构不宜过窄, 要增加校级公共课程。

2. 把专业设置权还给学校。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应更多地关注学校的专业设置条件、评估专业培养质量, 用政策引导高校举办社会急需的专业, 而非过多地行使审批的权力。除了一些校级公共课程外, 专业和专业课程的设置权应该交给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决定。

3. 切实转变专业管理的思路。建议教育主管部门更新专业管理理念, 加强对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指导和监督。比如, 督促高职院校利用专业建设验收、就业情况检查、用人单位用工测评等手段, 使专业的设置和调整在机动灵活而又规范有序的状态下进行。

(《教育与职业》2013年第34期)

理事会制度： 高校协同创新中心管理体制的创新

一、高校协同创新中心的属性及其特点

高校协同创新中心是高校联合其它创新力量协同创新的新生事物，是在教育部、财政部以及地方政府领导下，面向重大问题或迫切需求，以高校为实施主体（牵头单位），积极吸纳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国际创新力量协作攻关，集人才培养、科学发现、技术创造、产品开发、经济和社会效益提升、体制机制创新于一体的新型创新平台。协同创新中心是推进高校协同创新、提升自身创新能力的平台。其创新能力的高低决定于平台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水平，而管理体制是否顺畅与管理水平的高低又依赖于对协同创新中心组织属性及特性的认识。因此，把握协同创新中心的组织属性及特性对创建、培育以及管理协同创新中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高校协同创新中心的组织属性

1. 实体性。协同创新中心是由高校牵头、其他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或政府机构共同参与的实体运作组织。这种实体运作表现为：拥有独立的办公、实验和资料室用房；固定的人员编制；独立的用人机制；雄厚的科研设施及多样化且稳定的经费来源渠道。这些软硬件的有机结合决定了协同创新中心不是单纯以产学研项目合作为日的的虚拟组织，也不是仅依靠合同约定而形成的多方人员从事科研攻关、科技应用的临时组织，而是一个具有持续性产出的相对稳定的实体组织。

2. 公共性。高校协同创新中心本质上属于跨机构领域、多功能集成、多元创新力量协同的公共创新平台。它是由大学、科研院所、企业与政府机构共同参与，集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和人力资本产出等于一体的公共创新，关涉公共资源投入、公共创新成果管理、公共利益的分配、公共风险的分担等公共治理问题。所以，协同创新中心管理必然涉及如何对公共资源投入方向等做出统一规划和部署，保证各创新力量的共同追求和公共资源的高效配置；如何协调多元利益和风险分担是实现创新中心协同的关键。

3. 独立性。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在组建时就跨越了高校组织边界，联合了其他协同单位，所以中心在机构建制上不同于学校其它二级学院简单隶属于牵头高校，而是一种有自己的

独立使命和机构章程的实体组织，具有独立的财务管理权、独立的用人机制和自主的人才培养模式。“2011 计划”规定中央政府设立专项基金，对经批准认定的“2011 协同创新中心”，给予引导性或奖励性支持。地方政府也提供财政资助或各种免税优惠政策，另外还有来自企业的科研经费以及学校的自留资金。所以，协同创新中心实行单列计划、单独考核、单独管理、单独核算的财务管理制度；人才使用上，各高校协同创新中心拥有岗位设置权和岗位聘任权和内部分配制度；人才培养上，协同创新中心可以根据中心愿景、中心使命目标以及特长招收本科生、研究生，有自己独立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目标、招生机制、培养模式等。

但是，协同创新中心的独立性具有相对性，因为它是响应国家政策和高校规划所设立的，与依托学校、协同单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必须接受政府的调控和牵头学校的管理。协同创新中心一般要与牵头学校签订目标管理协议，接受牵头高校所组建的协同创新领导小组的指导和协调，领导小组帮助协调和解决创新项目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并以学校名义组织校内外相关专家对本校协同创新中心开展年度检查，督促协同创新项目的顺利开展和有序进行。

（二）协同创新中心的组织特点

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具有的组织属性决定了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具有以下几个组织特点：

1. 多主体协同攻关。协同创新中心的创新主体，不再是过去纯高校或清一色的科研院所或企业单位，而是包含了人力资本产出的高校、基础研究的科研院所以及技术创新的企业，也包括政府、金融机构、科技服务中介组织及国际行业领域机构或专家，集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和人力资本产出于一链的创新体系。而且这些机构或人员都是协同创新中心的合作主体，在中心占有一席之地，代表自己的利益，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或是从事本领域研究的理论专家，或是致力于攻克此应用瓶颈的技术人才，或是掌握各种市场信息、国际动态的权威人员。这些科学家群和技术专家群在重大急需问题面前总是协作攻关，提供各类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的支持，力求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上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创新。

2. 多学科交叉研究。当今的科学研究摒弃过去专注于单一学科建构研究的弊端，放眼于现实重大问题，回归社会生活实际。协同创新中心在运作过程中，紧跟现代科学所呈现的多学科内容交叉渗透和融会贯通的趋势，十分强调学科交叉的组织模式。事实上，现代科学的许多成果就是学科交叉融合创新的结果。如 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物理学、生

生物学和化学等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在协同合作的过程中发现的。享誉世界的斯坦福大学“生物学交叉学科研究计划”包含了涉及生物科学、生物工程和医学领域的众多学科，将基础理论、应用研究和临床科学的前沿结合在一起，促进整个生物医学领域从分子尺度跨越到人类器官尺度的技术创新。特别是在当今“大科学”时代，多学科联合攻关、跨学科融合创新成为解决重大科技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因此，以解决重大问题或迫切需求为导向的协同创新中心必然诉诸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科研模式。

3. 多目标重叠并存。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具有围绕核心目标下的多目标重叠并存的特点。这与多利益主体协同攻关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即围绕着本中心的核心目标——重大问题或迫切需求，各个协同主体还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并且这些利益诉求是能够跟协同创新中心的总目标相适应的，更确切地说是围绕总目标的实现来满足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高校希望通过协同创新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学术荣誉、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科研机构期望通过多方合作实现知识创新，获得科技发明。企业更关注于市场的需求和利润的获取，希望通过合作方的科技与人才资源，促进产品开发、成果转化，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益。政府则希望通过协同创新实现科技、教育与经济的无缝对接，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所以协同创新中心的一大组织特性就是目标多元重叠并存。

4. 多功能集成化创新。协同创新中心是一个多功能集成组织。以往的高校侧重于基础研究，企业和科研院所则分别致力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这三种科学研究是相对孤立且在不同的空间中进行。而协同创新中心通过围绕一个总体研究目标，将大学、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等创新主体紧密联系起来，把原来分散在许多研究机构和研究领域的研究者积聚到同一个机构协同攻关，从而把基础研究、开发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集约在同一个机构内。伴随着科学研究的集约化，协同创新中心把人力资本生产、科学发现、技术创造、产品开发等活动有机地整合起来，在短时间内把一大批优秀的相关领域科学家集中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多功能集成化创新。

二、高校协同创新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创建时间虽短，但是发展快速，协同效应初步显现，具有分布广泛、模式多样、面向多元、定位高远、分布式协同性创新等特点。这些中心分布在全国 167 所高校中：有的中心是高校与高校之间协同的，有的是高校与科研院所协同的，有的是高校、企业与科研院所协同的；有的协同创新中心协同单位只有 3 个，有的则有 52 个；有中心面

向行业产业，有的面向科学前沿，有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有的面向区域发展。各中心本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目标瞄准国家急需的战略性研究、前瞻性研究、公益性研究；中心运行呈分布式协同性创新发展趋势。

高校协同创新平台是高校发展中的新生事物。对于协同创新中心而言，制度的创建是开展协同创新中心培育工作的前提，也是机制体制改革实施的根本保障。在本质上，协同创新中心的培育过程就是各种制度建立、完善、实施的过程——即管理体制建设过程。在协同创新中心培育和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组织架构：单一学科导向

协同创新中心的组织架构本应是一种体制、机制的创新，应以“需求导向”为原则来架构管理制度，需打破各部门间的条块分割，又要以创造性和灵活性为特点创建新的管理制度。长期以来，有关基地建设、工程实施、科研计划等许多科技工作大都是围绕学科系别或专业领域这种传统目标模式进行设计和实施的。一些协同创新中心受传统思维定势的影响，没有真正从如何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如何提升创新能力、如何改革体制机制出发，依然运用传统、单一的学科科研组织模式或浅层产学研联合模式来设置组织架构，这种传统学科科研的组织架构，产出的必然是著作、论文等知识成果，会出现知识转移困难等问题，导致科研成果束之高阁，对经济社会作用甚微，最终影响协同创新中心以重大急需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创新能力提升。

（二）利益分配：动力不足

利益分配问题是产学研问题的矛盾焦点，也是协同创新中心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制约产学研合作最关键的就是高校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冲突，而且一直以来存在于高校产学研合作中，直接影响产学研合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我国许多产学研合作没能取得成功，当然有认识和制度上的偏颇，其中由于利益分配的不合理而导致失败的占相当大一部分，因利益分配不合理而导致合作失败的约占50%。”因此，“利益分割是目前制约协同创新的关键性问题，也是调动科学家参与协同创新积极性的关键因素。”利益分配问题将导致参与协同创新的各路创新力量动力不足，导致主动性难以调动，积极性难以发挥。

（三）管理体制：阙如或垂直僵化

目前我国许多产学研合作科研项目普遍存在“重申报轻管理”、“重组建轻治理”的问题或管理阙如，或管理垂直僵化、治理缺位，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团队申报、

集体研究的项目，由于团队疏于管理或管理松散，呈现若有若无的无政府状态。有的项目虽然是团队申报并且要求团队完成，但由于疏于管理导致项目实质上是个人完成，项目完成的质量打折，时效性难以保证。另一种情况是，许多项目强调威权管理，实施管理垂直化，导致项目管理过程僵化，以致参与创新的主体主动性缺失，创造性凋谢。而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创新主体多元，创新力量多样，创新资源公共化的模式复杂，如果简单采取松散管理或垂直管理，都难以确保发挥每位研究人员的自主性，更难以充分调动他们参与项目研究的积极性。因此，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管理制度来确保创新活动的顺利实现。

三、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实行理事会制度的必要性

（一）实行理事会制度有其合法性依据

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实行理事会制度有其合法性依据。一种制度的“合法性”不仅仅来源于法律制度，同时也来源于文化制度、观念制度、社会期待等。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实行理事会管理制度至少具有三个合法性解释逻辑，即法律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期待。

1. 合法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五条：国家鼓励高等学校同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推广等方面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第三十七条：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和精简、效能的原则，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提高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能力。”教育部、财政部出台《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和《“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实施方案》中提出，建立一批“2011协同创新，构建科学有效的组织管理体系，成立由多方参与的管理机构，负责重大事务协商与决策，制订科学与技术的总体发展路线，明确各方责权和人员、资源、成果、知识产权等归属，实现开放共享、持续发展。”可见，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建立理事会管理制度，加强高校与社会其他机构的合作是受高教法保护的，也是符合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精神的，更是国家“2011计划”实施方案的具体化。

2. 合文化制度。建立高校协同创新中心的理事会管理制度也符合人类文化制度的要求。一种制度的建立反映的是对一套文化传统价值的认同。理事会制度虽然起源于西方社会，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即“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中产生和发展出来的，这种价值

观强调个体的参与，认为只有参与各种组织或活动才能实现所追求的民主、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追求。因此，民主参与自然成为最初理事会制度设计者追求的基本价值理念，也被人们所认可和追随。协同创新中心实行理事会制度也是对各成员单位民主参与以及对重大决策进行表决的最好诠释，有利于充分平等地表达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发挥参与主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3. 合社会期待。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实行理事会管理制度也符合公众的社会期待。这种社会期待反映在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和适应各种群体的不同要求制定出来的群体准则和行为规范上。这些准则和规范对该群体的个体起作用，成为个体的行动动机。理事会制度实质上是一种重大决策表决机制，能够很好地处理多方利益诉求。符合这样的社会期待，即适应协同创新中心的组织特性，协调好传统产学研之间的矛盾，最终能够实现组织目标最大化以及满足各合作方的利益。

（二）实行理事会制度是一种具体反映组织属性的管理创新

一种制度创新还必须适合组织的属性，否则，这种制度创新难以实现制度的功能。如前所述，实体性、公共性和相对独立性是高校协同创新中心的基本组织属性。这些基本组织属性呼唤自治化的管理体制。特别是相对独立性意味着协同创新中心本身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力，应该采用现代管理特征明显的、具有自治属性的管理体制进行治理。理事会制度即是这样一种具有自治属性的自我管理体制。理事会管理体制规范成熟，体现出明显的自治特点。首先，理事会制度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是自愿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小。理事会的成员都是自愿加入，并愿意提供服务；其次，理事会的资金来源相对比较独立，不受制于任何一个单位和个人，有稳定的多渠道的资金来源；再次，理事会制度作为一个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和决策机构，赋予了理事会一定的自治权，包括制度制定权、日常管理权、统筹规划权等；最后，理事会有比较完善的自我管理体制。从理事会制度本身的结构可以看出，理事会的权利并不是集中在理事长个人手中，而是分散在理事成员、执行主任、各个部门常设委员会之间。完善的自我管理体制是理事会制度自治的必要保证。

理事会制度从根本上说是组织自治权力的保障和约束机制。协同创新中心实行理事会制度代表高等学校和政府、社会共同参与治理，既可以保持高校与政府、企业之间持久稳定的联系，保证创新元素的有机组合、创新资源的持久流入和社会需求的有效反馈；又可以防止政府及企业对协同创新中心自治权力的过分干预；同时还可以约束学校过多卷入经济市场和政治舞台，保证高等学校的学术自由特点和创新服务社会性质的实施。

（三）实行理事会制度是与协同创新中心组织特点相适应的制度创新

一种制度创新还必须与其组织特点相适应，否则，这种制度创新难以保证组织目标的达成。如前所述，协同创新中心具有多主体协作攻关；多学科交叉研究；多目标重叠并存、多功能集成化创新等组织特点。多主体协作攻关，势必造成中心人员和资源协调困难，带来不同的价值取向，引起多目标重叠并存，容易导致多方利益分割与风险分担的问题。倘若处理不好这个关键问题，组织命运便岌岌可危。因此，协同创新中心必须选择一种能够协调与权衡多方利益的管理体制。而理事会制度是理事共同治理制度，即事关组织发展动向的重大事务都由理事会裁度。在理事会制度内实行单位成员理事会制——凡是组织的参与方都应有至少一名理事会成员，能够广泛代表其成员利益，可以保证多方利益的权衡协调。

同样，基于多学科交叉以及问题的重大性与迫切性的组织特点，协同创新中心应对的是异常复杂、及其重要或迫切需求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组织决策的制定就显得非常关键。根据现代管理的理念，涉及组织发展的问题越复杂、越重大、越紧迫，决策的制定就越难也越关键，决策的有效并快速执行也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基于多学科交叉及问题的重大性，协同创新中心应实行一种能够科学规范地制定决策，快速有效地执行决策的管理体制。而理事会制度强调决策层与执行层分离，理事成员协商制定科学决策、并交由执行主任负责实施决策。从决策层角度来说，理事成员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是本领域的资深专家，可以在协调不同目标的基础上制定规范科学的决策。从执行层角度来说，执行主任受理事会委托从事相关的管理工作，快速执行决策层的政策，双方同时避免了既要掌舵又要划桨的局面，各负其责、各司其职。

综上，理事会制度是符合协同创新中心组织属性和特点的一种管理体制。理事会制度实质上就是重大决策表决制，倡导群体决策和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既可以综合权衡各方利益，又能较快地做出科学决策，并且决策层与执行层的有机分离能够最大限度保证组织目标的顺利实现；更重要的是，它能克服过去产学研合作中所遗留的组织构架、利益分配以及管理体制问题。

四、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实行理事会管理的制度优势

理事会制度符合协同创新中心的属性和特点，将理事会制度应用于协同创新中心能够明显体现出现代管理制度的优势，这些制度上的优势恰好能够满足协同创新中心组织的需求。

（一）共同治理可以为高校创新能力提升提供正能量

理事会制度的魅力在于理事会成员的多元化及其代表、反映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秉持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理念，获得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智慧贡献和其他服务，可为高校协同创新发展提供正能量。在理事会制度的治理框架下，理事会成员是公众代表，代表公众决策，共同管理协同创新中心。高校协同创新中心既接受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的公共支持，还可以获得政府的拨款资助，更重要的是还能接受公众的监督，并为公众谋福利。从组织结构上看，理事会成员由举办单位负责人、地方政府负责人、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国际领域知名的学术专家、管理专家、专业人士等代表组成。每位代表都能为高校创新能力的提高贡献自己的智慧和为其发展提供正能量。单位负责人和政府可以为协同创新中心发展带来所需的发展经费；学术专家和技术人员可以为协同创新中心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和人力资本生产带来知识支持；管理专家通常是社会各个领域有广泛业缘的人，可以为协同创新中心的发展带来资源和宣传效应；专业人士，譬如律师、会计师、广告公司的负责人、顾问公司的合伙人等，可以为高校协同创新能力提升带来免费的专业服务和建议，对规范中心的发展十分重要，对中心行使使命也很有帮助。理事会成员的多元化与专业化能够带来更多的创新理念碰撞，也能够更广泛的反应成员利益，可以保证多方利益的权衡协调，从而为协同创新中心发展带来活力。

（二）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有利于保障高校协同创新健康、有序发展

根据理事会通行的做法，理事会制度分为理事会决策层和理事会执行层。其中理事会会议是最高决策机构和权利机构，所做出的最终决议具有有效性和约束性。而执行层是在理事会下设执行机构，执行理事会最终决议。在高校协同创新管理制度框架中，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及其中心则是理事会的执行层。中心主任是决策的执行人，代表本机构行使执行权。理事会处于权力的中心，对执行层起着支配作用。理事会负责聘任执行层的代表人——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中心主任受理理事会委托负责中心的日常运营，对理事会负责，在理事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执行理事会的最终决议。这种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反映的是一种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制衡的理念预设和制度框架。既可以保证决策层较快的做出科学决策，又能够最大限度保证决策贯彻执行，达到一种权力监督与制约的状态。

（三）决策民主化有利于保证高校协同创新决策的合理性

理事会作为一种制度设置，是一种扁平的治理结构，而非垂直治理结构。一般而言，

垂直治理结构容易导致“一长制”的极权专制制度；而扁平化的治理结构则催生民主平等决策机制。所以，理事会制度的制度优势就在于其可以规避极权制，践行决策民主化。一个机构实行理事会治理制度，不是为特定项目设立的临时委员会，而是一种长期治理结构，其功能是为了获得组织面临之重大问题的感悟。为了获得对协同创新中心的重大事务的感悟，理事会都要定期开会，多者每个星期一次，少者每个季度一次。在会议上，成员相互尊重，理事会为了获得感悟进行争辩和讨论，特别是在重大事项决策上采取理事会议制度。在理事会会议上，采取一人一票的投票决策制，并要求有一定比例即三分之二以上的理事出席方可召开理事会会议。这种组织与管理制度可以避免组织内部个人偏好而独断的风险，也可充分吸纳理事会成员的个人智慧，因此，建立理事会制度实行理事会治理，有利于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实行集体决策，民主管理，可以避免因个人偏好而决策，预防组织内部的个人权利过大，并由此产生“拍板决议”，大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而保证协同创新的协同效应。

协同创新中心是一种应运而生的新生事物，它代表了高校新的发展方向，成为联结高校与政府、社会的关键枢纽。目前对协同创新中心应实行什么样的管理体制的研究少之又少，很难说理事会制度是所有管理体制中最好的制度。但是如果找不到比理事会制度更加普遍有效的管理制度的话，那么它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就如人类社会之所以认可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多么灵验有效，而是因为人类至今尚未找出比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普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理事会制度对于高校协同创新中心而言亦是如此，不一定是最佳选择，但是至少其制度本身是符合协同创新中心的组织属性和特点的，而且还可消解协同创新过程中的各种张力和矛盾，如此说来，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实行理事会制度有着天然的不可或缺的制度优势。

（《教育发展研究》2013年第21期）

国际化的五个误解与五个事实

国际化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过程，同时也逐渐成为一个更加容易混淆和误解的概念。

“国际化”已经不处于“正当红”的阶段，其慢慢被纳入了很多机构的使命宣言、政策并融入到了国家策略的框架之中，这标志着国际化已经进入“新时代”，也自然而然地成为高等教育政策、实践和研究等领域的重要因素。简而言之，国际化已经涵盖多个方面，并失去了其原有的含义和方向。文章指出了近年来有关国际化的错误概念及误解，并作进一步探讨。此外，鉴于误解的存在，笔者有必要对国际化的事实和指导原则进行说明。

一、对国际化的误解

（一）国际学生即是国际化的代理人

通常认为，一所学校的国际学生越多，国际化程度就越高，国际交流活动就越丰富。或许这只是对学校的期望，但现实往往与其相反。在本地学生和国际学生共同参与一些社会活动或学术项目时，除非是学校指定的合作项目，本地学生通常都是加以抵制的，能够保持中间立场，已实属难得。更为讽刺的是，国际学生通常趋向于群聚，这与本地学生是不同的。国际学生拥有丰富的跨文化经历，但是通常缺乏对留学目的国文化的深入了解。虽然这些情况不一定在所有大学出现，但大学招收国际学生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创造国际化的氛围，然而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意愿，现实并不都是往这个方面发展的。更糟糕的是，招收国际学生已为其他动因所利用，如扩大学校招生范围或提升学校全球排名。

（二）国际声誉等同于教育质量

通常认为，国际化程度越高（包括学生、教师、课程、研究机构、校友网络等方面），学校的声誉就越好。人们就会错误地认为学校国际声誉越高，其教育质量就越好。例如，高校录取和毕业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国际学生所带来的收入及“品牌效益”，这也说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并不完全意味着教学质量的改进和相关标准的提高，此外学校期望提升排名名次，情况由此而变得更加复杂。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排名是否能够真正准确地衡量高校的国际化？国际化这个尺度是否就是检测质量的稳定的指标？

（三）国际合作协议越多，学校越具影响力

通常认为，一所学校拥有越多的国际合作协议，或者是成为很多国际网络关系中的成员，该校就更具声望和吸引力。但实践证明，大多数院校并不能很好地管理这些协议，也不能从这些协议中获益。要保证院校之间积极和有效的合作，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方面的投资。因此，很多国际合作项目只是反映在纸上的协议，而没有太多的实质性合作成果。同样，很多学校把国际合作协议作为一种地位的象征，而不是真正的学术合作。事实上，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学校应减少合作协议的数量，重点与10-20所学校保持优先合作，这也是近期发展的趋势。这样可以引导更加全面和可持续的合作，不过这种自上而下的国际化会减少个人参与国际研究和国际课程的机会，可能引起教职工和研究者的不满。

（四）高校拥有的国际认证越多，国际化程度越高

国际认证主要是指来自国外其他国家国际质量保障部门（特别是来自于美国）或者专业（商业和工程类等）认证协会的质量认可，目前在全世界各类高校普遍流行。人们都认为，高校拥有越多的国际星级质量认证，其国际化程度就越高，但事实并非如此。国外质量认证体系并不参考与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相关的范围、水平和价值取向。

（五）国际化的目的是创造全球品牌

第五个误解是：国际化的目的就是提高全球品牌知名度或全球排名。这混淆了国际市场行为和国际化策略的关系，前者是提升品牌的行为，后者只是一种策略，旨在帮助大学在教学、科研、管理与服务方面与国际接轨，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品牌行动的目标、结果和投资与高校学术国际化的需求完全不同。实际上，国际化策略的实施可以拓展我们的国际视野，但这不是国际化的目标，只是一个副产品。

国际化的优势和程度常用以下常见的错误指标进行衡量：国际学生数量、国外教职工数量、国际合作协议、跨境教育项目、研究项目、国外认证、海外分校等，用这些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s）衡量国际化成果可能符合要求，但是不能满足包含学生、教职工、研究者和社区等与人相关的关键无形指标（Key Intangible Performances, KIPs）的要求。

这五个误解并不是全部适用全球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但反映的是最常见的误解。因此，我们有必要去检验一些基本事实和国际化进程的指导标准。

二、国际化的事实

（一）国际化以本土环境为基础，尊重本土环境

国际化承认国家和区域发展重点、政策及实践，并且是在这些基础之上建立的。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关注不应该掩盖或削弱本土环境的重要性。实际上，国际化是为了补充、协调并扩展本土环境，而不是掩盖本土环境。如果不认清这一基本事实，很可能引起大众的强烈反对，他们会认为国际化既单一又霸权。如果忽视本土环境，国际化将失去其真正价值。

（二）国际化是一个定制的过程——“一个尺码不适合所有的脚”

国际化是把国际的、跨文化的及全球化的因素与高等教育目标、功能及分配相互整合的过程。它是一个定制和变化的过程，用来满足个人需求和高等教育实体的利益。因此，世界上不存在“一刀切”的国际化模式。有时候我们将国际化设定为一套“流行”和“品牌”的目标和战略，而否定每个项目、院校或国家特定的需求。在国际化进程中，各院校应根据自身情况，采取自身独特的方法来实现国际化的目标。国际化进程是由院校个体需求和优先发展评估来决定的，标准的“公式化”或最新“流行”的方法并不适合所有院校，也不可能实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三）国际化带来利益、风险和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毫无疑问，国际化能带来许多益处，如果只是专注有利一面，往往会忽视一些风险和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第一，国际专业人才流动造成人才流失，当前人才流动的概念，并不承认流动会对那些处在人才链底端的国家造成人才流失的威胁。第二，对国际学历证书的需求导致虚假文凭的泛滥，学位认证“文凭磨坊”（Degree Mill）兴起。第三，有些高校过分依赖国际学生的学费收入，从而造成学术标准降低，导致“签证工厂”的兴起。第四，跨境特许和姊妹项目越来越商业化，对一些地区的高等教育质量造成影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最近相关调查表明，高等教育的领导者仍然相信国际化的好处大于风险，但我们需要同时关注国际化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四）国际化不是目的本身

国际化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这是一个常被误解的真理，会导致曲解

什么是国际化。后缀“ization”意味着国际化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是实现目标的途径。例如，国际化可以通过改善教学、促进国际流动及增加包括比较元素、国际元素和跨文化元素在内的课程来帮助学生丰富知识，提高技能。国际化的目标不在于开设更加国际化的课程或加强学术流动，而是确保学生在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的世界里更好地为生活和工作做准备。国际化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因此，学校应将国际化融入到教学、研究及社区服务中，真正促进国际化发展。

（五）全球化和国际化有所差异但又相互联系

全球化重点关注理念、资源、人、经济、价值观、文化、知识、商品、服务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国际化则强调国家、人、文化、制度、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全球范围流动”不同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既引人注目又影响深远。毫无疑问，这两者的过程有本质的不同，但却紧密相关。例如，与全球化有关联的竞争力和商业议程对跨境教育有着重大影响，而包含在双边或区域贸易协议里教育国际化合作又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化。

上述五个误解和五个事实说明，对于不同人、不同机构和不同国家，国际化有不同的内涵，并将一直存在差异。但是，谁能预测国际化是否会从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基于合作、互惠互利和身份构建的过程，逐渐发展为更加趋于以竞争、商业化、利己主义和身份构建为特征的过程？因此，我们要更加关注和支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质和价值所在。

（《世界教育信息》2013年第22期）

大学国际化基本趋势及评价研究述评

大学国际化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ization) 的发展态势为世界所瞩目。众所周知, 国际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竞争, 大学实施国际化战略是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 提升大学国际竞争力的举措之一。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今天, 大学国际化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招生制度改革被称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三大热点问题, 是促进大学可持续发展、提升大学国际影响力的系统工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大学国际化看作是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观点、氛围与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笔者通过对大学国际化有关问题的研究和分析, 对近年来大学国际化发展趋势及概念、评价方案、指标体系进行了概括, 旨在抛砖引玉, 进一步扩展相关人士对大学国际化问题的思考。

一、国内外大学国际化趋势与研究概况

(一) 国外大学国际化发展趋势简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大学协会 (UNESCO-IAU) 于 2009 年开展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调查是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 旨在找出驱动和阻碍国际化的因素, 并对国际化带来的益处进行了分析。调查数据显示, 国际化的大学在学生的国际思维、研究成果、知识产出、课程国际化、合作交流和国际声誉等方面都有显著提高。近年来, 欧美国家的学者们对大学国际化问题的研究与报告日益增多, 促进了这些国家大学国际化的进程。这些研究因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 形成了三种趋势。

趋势一, 欧洲博洛尼亚进程的实施, 促进了欧洲各国大学国际化。近年来, 欧洲联盟主要通过《博洛尼亚宣言》(Bologna Declaration) 和“伊拉斯谟世界计划”(Erasmus Mundus) 等, 推进欧洲高等教育的一体化, 从而促成了欧洲各国大学之间的合作与竞争, 达到了互赢与共存, 为欧洲大学国际化和欧洲科技教育一体化作出了显著贡献。

趋势二, 欧美国家在促进大学国际化方面有许多趋同之处, 达成了诸多共识。国际教育界对大学国际化的普遍共识是, 将国际留学生 (International Students)、海外教师 (Foreign Faculty)、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 Items)、国际拓展课程

(International Out Reach Class) 等观测指标作为优先考虑因素, 国际化大学的国际学生比例应占在校生总人数的 10%以上, 国际教师比例应占教师总人数的 12%以上。

趋势三, 欧美国家大学国际化研究与实践, 使大学国际化成效突显。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大学国际化程度已经相当高, 他们在国际留学生人数、国际教师引进、国际合作办学和国际资格互认方面都走在了世界前沿, 欧美国家大学平均留学生人数已占到在校生总人数的 15%以上。美国外国留学生事务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Foreign Student Affairs, NAFSA) 数据库显示, 2001 年, 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f Education, ACE) 在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 的资助下, 对全国范围内的 144 所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2003 年, 美国教育委员会正式出版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评估报告》, 该报告公布了评估对象、内容和结果。2006 年, 美国教育委员会又进行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问卷调查, 为研究型大学了解自身国际化水平及未来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指导和建议。

综观国外大学国际化的具体做法, 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由国家层面制定大学国际化的相关政策与规划。近年来, 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制定出了相关措施以促进大学国际化进程, 在开展大学国际化的研究和学术交流方面日趋频繁, 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世界各国大学国际化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分析。澳大利亚制定了本国的大学国际化发展目标, 并于 1996 年成立了国际化研究机构和澳大利亚教育基金会(Australian Education Foundation, AEF), 留学生人数超过 30 万。

第二, 由大学制定并实施促进大学国际化的措施和计划。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大学国际化措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实行课程国际化, 实现合作模式创新; 二是加强大学质量监控, 维护大学国际声誉; 三是采取积极措施吸引外国留学生, 对本土学生与海外学生一视同仁; 四是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 拓展海外教育项目。英国以树立品牌、引入竞争和经济利益为先导, 利用语言优势为本国经济贡献了数百亿英镑, 高等教育机构成为英国经济重要的雇主和营利者。据英国大学组织(Universities UK, UUK) 调查, 英国留学生人数已达到 44.5 万人, 占在校生总人数的 25%以上, 国际教师人数所占比例近 30%。创建国际化课程和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是美国大学国际化的重要措施, 尤其在跨国高等教育、师生流动,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目前, 美国留学生人

数已超过 72 万，占全球留学生总人数的 1/3，占美国在校生总人数的 30%，国际教师比例超过 30%，国际课程比例达到 1/3（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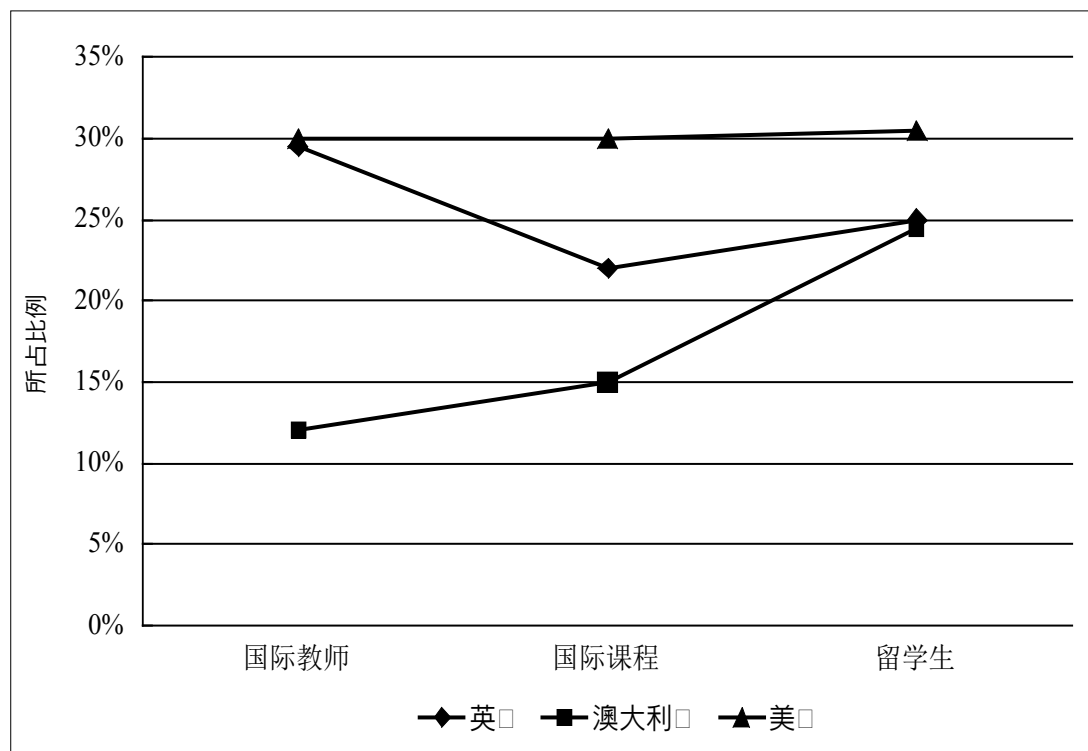


图 1 英国、澳大利亚、美国近两年国际教师、国际课程、留学生所占比例

在亚洲，日本的大学国际化程度处于领先地位。韩国近年来高度重视大学开放式国际化理念，通过法令和政策保证大学国际化的发展，并积极开展国际化多元研究，从国家层面在短期内引进了近 90 名国际知名教授，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韩国的国际学生交流格外活跃，如大量推进各种针对学生的交换项目、访学、海外学习、暑期项目国际交流等，目前，仅在我国留学和访学的韩国学生就达到 6 万余人。

第三，专家衡量国际化成果和量化指标。欧洲国际教育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AIE）在其 2009 年年会上对大学国际化的核心内涵、指标设计原则等开展了充分研讨，并形成研究论文《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测量成功实例》（*Measuring Success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有观点认为，大学要实现国际化，首先就要考虑交流与合作，典型的量化标准应包括：外国留学生、博士生和研究人员数量，在校学生出国流动性，国际客座教授数量，与外国科研人员合作的出版物或是共同争取到的第三方资金。

（二）国内大学国际化研究动态与实践概览

随着国际化发展的不断深入，我国政府和高校研究机构关于大学国际化内涵与外延、国际化水平指标的研究形式与内容也逐渐丰富，国内关于大学国际化研究近况如下：

第一，以会议的形式进行研讨。具体围绕如何加强国内外教育交流、促进教育教学和管理与国际接轨、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突出高等教育办学特色等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内涵式发展的相关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和探讨。第二，专家学者以论文的形式对大学国际化进行评述。从1995年至2012年，我国关于国际化问题的研究论文就有300余篇。北京师范大学郭玉贵教授指出，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通过留学生教育促进人才资源国际化和多样化的做法不但推动了国家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还提高了社会开放性和多元化程度。一些学者还发表文章就大学国际化发展程度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少学者从树立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加快构建国际化的课程体系，强化适应国际化发展的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在国际化的进程中注重本土化，重视本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发掘，建立既与国际接轨又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等不同视角进行了论证。第三，以科研课题为载体深入系统地研究大学国际化。相关评估机构和部分研究型大学全面而系统地对大学国际化内涵、评估指标体系、具体操作方案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大学国际化的多元研究，为我国建立国际通行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提供了决策依据。

香港每年都有关于大学国际化的国际会议召开，也有关于国际人才的引进和流动等措施出台。香港大学是一所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大学，该大学现有45%的教师来自海外，学生分别来自50多个国家。台湾也对大学国际化高度关注，出台了诸多相关政策，如教育主管部门发布的《全球化下台湾高等教育国际化规划》，台湾政治大学教育行政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台湾高等教育提升国际化之影响与争议》等。

（三）大学国际化推进我国留学生人数逐年增长

随着我国大学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与日剧增。近三年来，来华留学生和我国出国留学学生数量都显著增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底，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超过40万，来华留学生总数超过32万，分别来自197个国家和地区。据预测，到2020年，来华学习的留学生人数将达到50万。

二、大学国际化评价指标的设定及意义

（一）大学国际化是国家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大学自身持续发展的需要

我国大学国际化水平与欧美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评价方法也有差异，因此，我们要结合国际规则 and 实际国情来考虑。大学国际化评价对大学主要起引导作用，大学自身也非常注重国际化评价所带来的激励机制。关于大学国际化标准问题的研究有很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喜多村和之先生提出的三个标准：通用性、交流性和开放性。美国教育理事会于2001年发布的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调研和统计报告指出，美国大学国际化主要侧重以下几个方面：本土学生的外语学习，出国留学教育（包括学者访问），课程的国际化，在招生方面对学生国际化特质的要求，教育交流活动（包括外国留学生教育和学者来访），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的专项支持和资助，劳动力市场对国际性人才的需求。在评估指标的制定上，美国遵循分类指导的原则，对研究型大学、综合性大学、专科学院三类不同院校选用不同的国际化评估指标体系，并在每一类院校中区分出国际化高度活跃的评估指标和活跃度低的评估指标，总结高度活跃的大学在国际化过程中使用频率较高、行之有效的策略，旨在改善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评价指标，并公布评估结果和提出建议。

（二）对大学国际化的判断，不是评估的目的，而是一种促进和引导

推进大学国际化引导作用的效益是隐性的，因此有必要强化其重要性。按照国际惯例，对大学国际化的审视多从教育观念的国际化、人员交流的国际化、课程设置的国际化、交流与合作项目四个方面来考虑。欧美国家多从国际标准下的国际化水平/程度方面进行量化和细分，而我国相应的评价标准还没有那么具体，有量化标准不足或标准较模糊之处。因此，具体标准要将国际通行做法同中国文化遗产相结合，从大学的国际战略、组织机构国际水平、教学国际程度、国际项目与绩效等方面来设定，综合衡量大学的国际化水平及其国际影响力。

（三）通晓国际规则是制定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的重要因素

关于大学国际化的具体评估主要涉及到以下四个方面：国际化定位与发展战略，国际合作的具体措施，国际化成果，国际化产生的绩效。另外，还要结合高校的自主预评结果、指标考察结果、调研问卷答案、附加分等，综合判断并进行权衡（见表1）。

表1 大学国际化观测指标项

内容	国际通行的几项核心指标 (自主预评及考察)	附加考虑因素 (调研问卷及国际网评)
国际留学生	占在校生总人数的比例, 生源国	社会声誉和能力表现
国际教师	占教师总人数的比例, 教职员工境外留学和工作经历	境外文章发表及学术表现
国际化课程	国际课程设计理念, 所占全部课程的比例	国际课程的多元化
国际化管理	管理人员的境外经历, 与国际接轨的管理模式	外语使用能力及语种
国际合作项目	国际交流合作项目数量, 境外合作办学影响力	国际声誉和成果

三、关于大学国际化评价的两点建议

(一) 明确国际化的外延与内涵, 优化评价标准

1. 如何衡量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在国际上已引起广泛关注

首先, 针对理论研究多, 实践研究少的局面, 有必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大学国际化评价体系, 全方位研究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与评价标准, 探索既与国际标准接轨, 又与本土特色相结合的中国大学国际化评估方案。其次, 就目前重复研究多, 具有原创性和研发性的高水平研究少的状况, 应对大学的国际化程度进行系统、有效的测评。笔者建议, 应在分析大学国际化内涵的基础上建立评价的维度和评价指标, 并在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信息收集和统计分析, 从而确定各项指标的科学性, 这样才能够构建完善的大学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

2. 大学国际化评价既要有国际视野又要坚持中国特色

要谋求更好的国际化发展, 就必须基于国际化实践, 并结合国情和本土文化特色, “国际规则、中国道路”是一个值得提倡的理念, 即通过提高大学国际化水平, 提升我国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和整体办学水平。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先生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大学要在弘扬本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先进经验, 努力成为跨文化交流的“共同体”。制定国际化评估指标体系, 既要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 又要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 着力培养既具有国际眼光、通晓国际规则, 又能回报社会、服务人民的国际化人才。

（二）正视发展机遇与挑战，提升国际影响力

1. 经济全球化给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合作与竞争的双重效应

一些西方国家利用自身的语言、品牌优势及优质教育资源与我国大学进行不对等竞争，既得到了大量的优质生源，又获取了高额的经济利益。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冲击和所带来的危机感能够使我国的大学加快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通过大学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实施，缩小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差距，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

2. 大学国际化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我国的大学

中国大学要有计划地扩大并加强与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一流大学、权威研究机构、跨国企业、国际银行、大学联盟、学术团体、学者个人等的交流合作。一方面，我们要引导大学的国际化发展，另一方面，要着力打造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品牌及完善相关法律保障，正确对待国际化与西方化，国际化与民族化，单向化与多元化，规范化与激进化的现实问题。大学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高校如果无法实现国际化，创新型的高端人才就会面临深层次的危机。我们既要抓住机遇，又要正视挑战，充分提升中国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并掌握更多话语权。

（《世界教育信息》2013年第22期）

欧洲高等教育政策研讨会： 慕课对大学不构成威胁

据世界大学新闻网2013年10月18日报道，近日，欧洲学术合作协会和欧洲大学协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主题为“了解慕课（MOOCs）”的高等教育政策研讨会，会议指出，慕课不会威胁传统实体大学的地位，原因之一是使用慕课学习的学生与在校园里学习的学生的来源不同。

伦敦大学国际项目负责人蒂姆·戈尔说，大部分学习慕课的学生都是具有学位的30岁以上的在职人员。学生能够在校园内积累社会经验，从教授那里得到支持和指导，因此校

园学习的种种优势作用都是慕课无法替代的。此外，慕课并不对弱势群体开放，很多地区至今没有互联网，学生根本无法学习慕课。欧洲大学协会高等教育政策主管迈克尔·戈贝尔说：“比如，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慕课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富裕国家，如美国、英国和西班牙，或者是新兴市场国家，如巴西。”

目前，欧洲高校共开设了 276 门慕课，到 2013 年年底将达到 450 门。西班牙高校开设的慕课最多，达 79 门；其次是英国（66 门）。开设一门慕课的费用大约为 2 万至 3.5 万英镑。戈贝尔说：“尽管美国慕课供应商例如 Coursera, edX 和 Udacity 公司主导了在线课程市场，但最近，欧洲的慕课平台也开始起飞了，比如英国的 FutureLearn、德国的iversity和法国的数字大学等。”

会上，一些发言者称，决定慕课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大学的知名度，而非慕课平台自身的服务质量。正因如此，FutureLearn 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目前还没有英国一流大学加入 FutureLearn 提供的平台，相反，很多美国一流大学加入了慕课行列。为了维护学校的品牌地位，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都不愿使用慕课。德美富布莱特项目执行董事罗尔夫·霍夫曼说：“这对于小规模大学来说也许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些大学担心，如果一流大学也开设慕课的话，那么将会吸走大批学生。”

霍夫曼认为，虽然市场是决定性因素，但从长远来看，慕课将更针对成人继续教育领域。戈内尔也认为，大部分学习慕课的人都是终身学习者，它将是一种额外的学习，不会取代高等教育。

（《世界教育信息》2013 年第 22 期）